

2022.11.10 再整理

2018-2022 2020 年的文章都丢了

索引

假如中美开战中国将何去何从 2018.5.12
美国的崩溃 2018.9.9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独裁和集权 2018.7.10
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去留 2018.10.12
党的还是国的，亦或是民族的 2019.4.22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 2021.8.16
中国人民的自由意识与斯德哥尔摩心理 2021.9.4
谈中国特色 2021.9.11
不得人和的中共 2021.2.15
意识形态斗争的预测 2021.9.25
人权二字，不是中共政府的挡箭牌 2021.10.13
导读《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2021.10.31
读书与思考，《中国大趋势》 2021.10.31
再看薛兆丰《反垄断的罪与罚》 2021.10.31
精神赤贫者的爱国 2021.10.31
个人崇拜是人民民主最大的敌人 2021.10.31
金权是社会平等的最后保障 2021.10.31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2021.11.21
教化的力量 2021.11.27
中国青年的消费主义 2021.11.27
谈一党专政：统一中的分裂 2022.3.2
多党制民主政体如何嫁入中国 2022.3.4
中国社会劳动力‘自我逆淘汰’乱象 2022.3.4
俄乌战争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2022.3.6
“修路”工程见中国基层民主体制问题 2022.3.11
把中国的“权力三角形”倒过来 2022.3.13
政治价值决定公民社会地位 2022.3.13
集体社会的支配者 2022.3.19
经济与政治的自由精神 2022.3.27
共产主义的矛盾 2022.3.29
五四小史 2022.4.12
社会革命论的谬误 2022.5.2
现代社会剥削系统的原理 2022.5.14
经济形态何以塑造社会政治形态 2022.5.19
民主的理解误区 2022.5.19
政治的竞争与垄断 2022.5.28
民主的自由批判 2022.5.28
劳动阶层的演化及政府管制经济的局限性 2022.6.4
干预主义经济的局限性 2022.6.12
谁养谁：自由市场的运行逻辑 2022.6.22
竞争的矛盾 2022.6.25
哈耶克法治思想的简析 2022.7.10
21 世纪：中国的围城 2022.8.15
政治的转轨与思维的改变 2022.11.18

假如中美开战中国将何去何从 2018.5.12

美国，众所周知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给他这份与他国开战的底气的毫无疑问是强大的军事实力，那么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每一个人最想弄明白的问题就是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我不是军事家，但是我可以站在客观角度上看待中国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美国的历史可以浓缩为一部血腥的战争史，这个国家的组成就是一些独立的资本，没有历史、文化，有的只是毫无意义的流行文化，反观中国，先祖上至百辈，这就导致了一个微不足道但是表现非常大的区别，美国总统川普在进行政治活动时经常出尔反尔，作出与之前想悖的事，并且不在乎人民的生死安危，这就体现出了文化的力量，中国人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虽小时候不理解，但是人之初、性本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话已经成为了我们骨子里的一部分，而美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有些人可能会说，美国人无赖的性情会在国际争端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其实这种说法不对，中国文化的一大部分就是把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天的小事化作为道理表达出来，作用在全世界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结果，就像川普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但是他草菅人命的后果就直接作用在他身上了，事实上，他当然不会用这句话来表达，但事实就是这样。到这里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个国际优势。

再来谈我其实没有资格谈论的军事领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两伊战争，美国上个世纪几乎一直在打仗，为什么呢？这要换个角度来看，古代，人们打仗是为了称王争霸，攻城掠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现代战争依然如此，老话讲：无利不起早，讲的就是这个理，但是美国的希望很好，出发点是赚钱、赚钱、顺便捞点国际地位，有一句话叫“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人吃人”这句话其中的意义是资本主义是单向的财富流动，平民个人财产受到侵犯时，就不得不借贷，这就掉进了一个无底洞，那么到还钱时拿什么换呢？当然是继续借，政府向老百姓借，向别的国家借，老百姓向别的老百姓借，所以美国才会疯狂地在国家之间挑起争端，只是为了挣钱，但是美国的帐没算好，导致投入反差，这只是意外，但同时也显现出了美国的另一个弊病，就是资本控制了战争。

到这里美国已经有两个劣势了：文化浅薄、立场错误，来谈战争中的问题，据相关媒体报道，当今一名美国大兵全身的装备的总价大约要花费差不多 2 万美元，这里面就包含先进的制式步枪、夜视力装备、防弹衣以及无线电站等，而一

枚最普遍的爱国者导弹要 170 万美元，在中国呢？一台装甲运兵车造价只有不到 20 万美元，一台坦克造价大约一百五十万美元，与一枚爱国者导弹相当，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这些装备几乎是在往里砸钱，那是什么人让政府购买这些天价武器装备的呢？有一小撮人是所谓财团的代理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基辛格），这些政府中的精英们和所谓“shadow government”左右着政府在购买武器时的决断，像刚被罢免的波音的高管、还有以前 LMT 的一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曾经大力推荐政府购买以上公司的军工产品，而在中国这些都是解放军直属或国家的工厂制造，更不存在幕后势力暗箱操作，所以美国又迎来了第三个弱势了：战争成本高。

回来看中国的劣势，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军事实力基本上还相当于小米加步枪之类，而且当时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先进的装备，我是一个反对盲目爱国的人，捧吹中国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其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两个国家就像一个脑子不灵的和一個天才，前者学了十年，后者想要在两个月内学完前者学过所有的课程，不排除后者的智力差距与前者相差较大，从字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发展根基不稳，在上面建起的大厦也不会建太高，毕竟美国研究了五十年的技术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研究出来，但是我们国防部从来都不像美国一样宣扬自己的武力，而是选择私下发展核心技术，现在难以推测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是可以判断出，中国距离和美国直接开战的水平还差不少。

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看中美战争，第一：美国不战而屈于人，也就是美国自行解体，或者是美国第二次内战，相比于中美直接开战，这两种可能性更加大，因为美国这几年前的外债越来越多，最后到达顶峰，债额冲破天花板时，只有两个结果，美国与大债主开展，之后一笔勾销，或者是美国解体，和平的消除债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的核战争，这有点不切实际，但是不排除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常规战争后美国进行核打击的可能，但是中国不会吃核武器的亏，一定会予以反击。

强国强军之路任重而道远，跻身世界前列还需人民努力。

美国的崩溃 2018.9.9

美国的崩溃，并非从当代开始的，也并非与它本身的制度体制无关，问题出在，它本身的现代化，科技化以及国际形象与地位，使这样一个本来就由低素质和有

色人种构成的种族熔炉式国家难以维持住由外转污染生产业，以侵略战争，信息战争和经济战争为主要手段的盈利，二战结束后，从朝鲜战场到两伊战争，常规武器技术扩散化以及核技术的普及也使它很难在军事上维持绝对的统治地位，即使通过政治以及其他手段赢得战争，也很难使亏损与利益持平，之后若有其他力量从中作梗，非既得利益与其产生的效应化利益也很难被美国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这样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问题的一小部分出在美国的制度上，若先后选上为同一党派或同一政治利益为目标谋取利益的总统，前人为可以为后任打下基础，但如果前后总统目的不同，前人所为就在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这种浪费使政策难以跟进体制，基层难以履行政策，奥巴马医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美国的社会团体和资本对于人民的直接控制在于债务，这样的政治花费又增加了一笔负担，资本间的角逐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民生方面，民众则是承担这种角逐带来后果的冤大头。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仍是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在核武器普遍化，常规武器装备技术普遍化的现代，想保持军事上的领先只能从规模和先进性找平衡，这就让美国的军费成了一笔天文数字，放眼长久，军队确立下的战略目标又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无疑增加了社会负担。况且美国的军队直属于总统，和资本之间的角逐又发生了关系，产枪的、产药的都需要打起仗来，这样才能维持盈利，美国总统有权利开战，也就是说美国总统代表的一方利益有权利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自己创造营收机会，打无用之仗，也增加了民众的负担。无论军队是打还是不打，动还是不动美国民众都不支持，在自己的国家美国军队都不被支持，将在外如何受君命？

对于一个超级霸权，若有另外一个实力水平相当于自己的霸权出现，各方面的威胁不会使它坐视不管，为了遏制另外一个强国的崛起，霸权会动用军事，政治，经济来加以打击，但像中俄这样舆论管理严格、军事实力逐步增强，经济底蕴深厚，政治手腕强劲的半封闭式国家，在美国已经进行经济军事上的交手后，中俄已经被美国变成了被加固的堡垒，之后若不发生核战争或者大规模战争，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是美国不敢打破的。这样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就像是一个放在身边的有危险的定时炸弹，若中国有一天不再给美国供应各种日用品，各种以中国为最主要采购地的商品立刻消失在市面上，美国人民的日子不会好过，以单向经济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即使由利益驱使运行，要打破这样的关系，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可能使美国社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社会结构，资本与人民的供需关系已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存在上百年的体制，改变自己统治的方式来维持政权，但美国政治始终为资本完全控制，议会同政府被资本控制，总统代表一方利益，这点与中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的资本是人民本身，中国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相当于代表自己的利益，但资本代表的是不同的两群人的利益，因此产生纠纷，此外，美国的每个州相对独立，各州政府代表自己利益，一些无法产生即时效应的工程就无法开工。

畸形的社会体制，不成形的社会福利政策，负债累累的人民，体制甚至难以维持自己的运行。

美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已经积累许久，离崩溃只差临门一脚，亡秦者秦，在不远的将来，亡美国者也将是美自己。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独裁和集权 2018.7.10

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提出了“三民主义”，其本质就是在民主政治基础上，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平等的社会，而“民主”一词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了这片古老的大陆上，中华上下五千年，从来都是皇帝一个人“自主”，而古代民主思想倾向的最好体现就仅限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代的人民“愚昧而勤劳”，正因为如此，在皇权的独裁统治之下，很少人敢于反抗，这也是历史必然的走向，但在现代社会，而且是已经实行过民主政治的社会中，还有过去时代政体的影子，令人费解。想要解释“民主”，就应该拿社会主义民主当反面教材，百科上是这么说的“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还甚至断言这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而对这种民主最好的解释则是每个人平分整个国家所有行政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行使的权利，当一份权利，无论这份权利有多大，如果享有权利的人过多，这个时候每个人可以分到的可行使的权利就微不足道了，况且就连这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政府也没有完全给予人民，而是转由人大代劳，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权的充分尊重，但是这又体现了一种对人“权”的极不尊重，如果说中国的政权要确定一个体制，那就应该称之为集权而不是民主，地方人大的权利汇集到省人大，在汇集到全国人大，最后决定权在领导人和政治高层手里，这种“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的只有外敌入侵是国家才会稍微专政一点的想法，就显得非

常可笑。

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开篇就已经说过了，百年前就被提出的三民主义，然而还有人愚昧而固执地认为所谓民主不过人民有投票权和完全意义上的话语权和自由发言权，也有人直接将美国所谓选票控制来类比民主，这是只看到了民主的表象，想要认识民主，就可以先从韩国和日本的选举制度来看，在中国如果想要当官，不仅要会送，还要会舔，资历够了还没有对手就自然会上去，或者家里有一个当了三年的清知府，但是在韩国日本，选举中政治人物的表现就像社会明星一样被放大了，选民可以清晰的了解到政治人物的履历，和他在选举过程中所做的事，虽然说不能保证人民的思想倾向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几乎所有选民都有最起码的明晰的是非观，想要选举出，相信，甚至崇拜一个领导人，首先必须要是选出来的，其次他本身在公众眼里的形象要是“裸体”的，但是“裸体”人肯定会被挑出瑕疵，所以民主国家不会产生对于一个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不给人民选举权、不让人民了解领导人的“黑历史”和掩耳盗铃没有差别，终究有人会发现这些的，而且当一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或者过去有过“黑历史”，人民最起码有权利把他投下去，把另一个人选上来，当所有政治人物都专注于挖掘政敌的黑料，那最后选上来的就一定是位圣人，毕竟政敌不会留情面，这种党争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杠杆的基础上，而不是谁在政府里拉帮结派狐朋狗友多谁就能搞一言堂来拿下自己的政敌，社会主义民主在政治斗争这方面相当于直接把公平的竞选变成私人恩怨上的争斗了，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相当于把本应该暴漏在阳光之下的东西藏在了黑暗之中。

民主还与另外一个概念密切相连，自由。自由指的不是单纯言论上的自由，而是人民思想上的自由，变相的说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种体现形式，敢于正确面对政治而不是个人崇拜，敢于批判自己的政府而不是一味的迁就，显然中国的人民已经被各种的新闻，文化资料，互联网上的信息控制了思想，从而导致人民看到的永远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当然，家丑不可外扬，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那里最起码美国人民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而中国人民也有，权利体现在吃饭喝茶是的闲谈之中，对比之下显得非常贫弱而无力，和婴儿啼哭而家长却不知道喂奶意义相同，而在美国执政政府当然希望家丑不被外扬，但是总有自由敢于说话的媒体去曝光，曝光之后，人民所抗议的政策、社会问题政府去不去改正，就和民主自由无关了，最起码美国的人民尽到了自己对于国家的义务。

民主还体现在经济上，非民主经济并不体现在日常的市场交易中，而是体现在资

本的聚集中，最起码民主国家的投资者会更加放心，因为不用担心自己的投资会突然被政府搜刮，在民主国家的经济治理，大多数依照法律判断，而不是看动没动哪个国企的饭碗，或者说又和哪个领导有私仇，又或者说是侵犯了党的利益，法治大于人治，民主经济给了市场更加公平的发展空间。

而对于一个国家，到底是应该实行民主，还是集权或独裁，还是应该依这个国际的现状而定，没有一种政体是完美无缺的，自由民主导致社会效率低下，集权独裁导致人民思想僵化，但是最起码对于中国来说，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日益强大的财力，政治的开明程度也应该和经济发展路线的开明程度共进。

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去留 2018.10.12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古诗词，打着传承与发展文化的旗号出现在中小学生的文化课本上，在白话文已经普及的当代，学习另一种文化形式有用还是无用？教育体系中这种传统文化该不该保留？

无用，不该，学生浪费的是时间，浪费的是精力，学习了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文体。那么这种文化不应该被传承吗？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种文化不该被传承，传承二字本就没有意义，有了曰心说再去学地心说就是故意选择退步，文言文，作为工于简洁力求模糊的文体，学之也对传承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无益。这种给现代文化带上的枷锁，困住了汉语的开放性与灵活性。若不把文言文给学生学，它也不会失传，况且它的文学内涵可以用更先进的问题来表达，若为会意，为何要学文言文？

诗词对传承现代文化的影响没有文言文那么大，与之相比文言文显得更加无味，既无诗的意境，也无词的优雅，相对白话文过短，相对诗词过长。虽然如此但学习古诗词时也应该有所选择，一首包含着千古名句的诗单，背一句就足够了。风景，情爱诗学生学了又不能体会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学之有什么用？

中国古往今来都是农业人口多，不识字的农民占据的国家，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阵地，绝不在私塾和太学中，而在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家中，当我们用一个成语，用一句谚语，就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添了一份力，书本知识则早已融入这些谚语成语和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了我们做事的底线，说话的度，做人的标尺，这杆标尺是无形的，但的却在起作用，现在却有人要毁掉这种形式独特的文化遗产，把无形的理论重化为有形，让小学生中学生去学去读去背，这不是在传承文化，

是在浪费学生们的时间去阻碍文化的传承。

讲一个人有文化有修养，并不是指他会背多少诗词，而是看他如何做事，如何做
人，而从这些古诗古文中感悟出做人道理的人，又能有几个？充其量可以将古诗
词作为爱好，称之为文化考古。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留，留其精华，去，去其糟
粕，虽然去后可能留不下什么，但若不去，浪费的就是学生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

党的还是国的，亦或是民族的 2019.4.2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话出自两千年前的政治家荀子之口，之所以被以为是水
的人民既能载舟也能负舟，是因为人民对舆论，或者说是消息，自古都有着获取、
讨论、传播的权利。在古代，如果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家的君主很难对其进
行干预。而以网络为主要舆论载体的今天，信息饱和驱使着民众自发地渴望获得
真实的信息，而不是被加工过的虚假信息。

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接受的信息一直是经过筛选的、加工过的，甚至是虚假的，
那么这个人在接受新信息时就会相较于上面的退而求其次，将比较可靠但客观不
完全真实的信息当做真实信息。放到生活中来看，一个国家需要让人民了解什么？
民生福祉的提高、国家的建设发展，甚至小到柴米油盐产量的变化，这些都与生
活相关。但现在民众获取的信息是什么？主要都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在某
种意义上增强了国家归属感，但相比于人民政府，可能是党更需要人民了解这些，
这些与民生无关，与发展无关，无非证明的是政府实力的增强，恰好利用了人民
对党国概念相当模糊的理解，让人误以为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在介绍国
家最高领导人时用的都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的主席，整个国家还是受团结在
总书记周围的党中央领导的，这样的暗示与明示，像纳粹德国街道上挂满的万字
旗一样令人作呕。早在八百年前，英国的大宪章就明确了王在法下的体制，放到
现在的中国来看，王应该是党，法应该是国，那么就呈现一种王在法上，王即是
法的局面，这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一百年之前中国的政体就是这样了。号称
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七十二年的历史中有一半时间仍然持续这种无法无理的类帝
制，让人无法理解，除了科技和军事实力的进步，新中国哪里新了？

对比国外，有多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会有媒体报道有关执政党的消息，但党
的概念被模糊弱化了，领导人和领导班子几年就下台了，不用为自己长久统治的

江山而准备，那么国外的消息来源对比国内就更有公信力了，国外的媒体虽都由资本控制，但网络信息舆论不会被政党所控制，人民了解到的国家是真实的，资本运作舆论也无非是控制选举和对当局的想法，和对国家民生的报道没有关系，最起码不像国内，媒体费时费力营造军队的政府的党的神秘性，让人民被蒙在鼓里，看不到军队的真实水准，看不到社会的问题，看不到党领导下的政府没有做到的事，这也非常非常令人作呕。

党对突发事件大选择性报道，和对舆论的导向操控，不仅在模糊党国的概念区别，也在模糊人民和民族的区别，习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为大陆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民族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很空，因为话术就是话术，人民就是指生活在土地上的一撮民众，民族指的是有向心力凝聚力的一群同根同属的人，那么党的高明之处显现出来了，党不仅说了民族复兴这句话，还把民族真的和人民混淆成一个概念了，人民政府当局和党直接代表了上下五千年所有炎黄子孙的意愿，各种强军强国的论调让网上的青年团结在了一起，以为自己是在为强国而奋斗，实则不然，将来还是要给资本打工一生。这其中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民族主义的具体化，种族主义的火苗开始在这篇大陆燃起来，对国内外黑人白人的负面报道是片面且让人产生片面的想法观点的，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敌视从美国警察美国罪犯变成了白人警察黑人罪犯。这是党希望看到的，在红蓝绿阵营的团结上再加了一层黄白黑的锁，让党的江山有稳固了一些，当现在的年轻人长成中年人时候，都管台湾人叫蛙蛙，管白人叫白皮猪，管黑人叫黑鬼时候，党在这方面上就成功了。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 2021.8.16

1951 年，第一套中小学用教材出版，从而引出了贯穿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种论调：读书方能成才。历经十年浩劫，1977 年高考恢复，学生又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九十年代末，受经济政策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教育产业化。每一次教改，都有负责的人打头阵，负责的人收尾，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推动我国教育行业的进步。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能否及时地改革教育，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本是否牢靠，其不限于教育的内容，形式和其他方面的配合也非常重要。

国家每一个动作都是有章可循的，但限于体制的运作速度，新政策出台和地方采

用政策的速度，时效性和对已经存在的政策针对的对象的影响往往相反。今年六月份，国家公布了整顿课外教育培训的新政策，家长和课外教育任教的老师之间因供需产生的教育产业链因此断链，新东方股价因此下跌 90%。之前的三公分班政策也无疑打击了相关人员的收入，类似这样的政策并未起实效，特权仍然能左右教育的公平，那么，教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青少年的命运，由谁来负责？问题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上，这种教育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要么是用力过头，没有考虑下一步发展，要么是给上一种政策打补丁。打击课外教育就是一个例子，在推出政策以前，国家需要的是高知识水平的人才，当读书才是出路的思想固化，人人把读书中考高考当做教育的代表时，本来国家所需的就已经过剩了，建设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资源，当农村的贫困学生第一次出村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找工作，教育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形式，考试、学习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成为了教育本身的目的，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开阔了眼界，同时家里人打工赚钱供着这样的人上大学，让本来需要忍受黑暗的人看到了光明，浪费的是家长的钱，多出来一个开阔了眼界的大学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出身决定得了未来的发展和起跑线，为什么要让起跑线已经落下别人很远的人去奋力追赶？浪费的是谁的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国家很明显看到了这点，打击课外教育，结合之前的减负、鼓励职业教育、增加在校学生体育运动时长、鼓励大中小学开设类实践活动等政策，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方向大调整的一部分，代表教育的重心从知识转变为技能，也就是国家在通过减少普通知识占比来培养工人，也就是廉价劳动力、人口资源。这就是对一个用力过头的政策打的补丁。

那么，这样用力过头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催生了课外辅导、改变了社会基本的家庭结构，在教育的部分中拉高了家长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畸形的状态，家长的管理逐步让学生失去自控力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的需求让一部分水平不够的教育者接管了本来应该由义务教育负责的部分，这其中义务教育没有责任吗？又不得不引入上面说过的国家体系运行慢产生的一个并发症，政策在不同部分的执行也是不同的，减负到了教育基层，迫于上述环境压力，教材逐步简化，而教育内容，或者说需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在增加，可以说义务教育在整个体系中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就导致了家长需要课外班，学校老师也需要课外班来分担教育任务。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从知识传递变成了筛选人口，现在又变质成了家长、学校、课外辅导三方对学生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这让人感到担忧。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陈旧思想和投机者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一系

列新政策带来的阵痛。在新的时代自我革新思想要明确教育的目的，规范教育的方式，这些不应该在学生家长的思想已经被转化为读书是唯一出路之后进行，教育关乎国本，只有有序地推进。在该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没有做好，没有管理好，就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无能，让现在教育环境的形成成了一场灾难。

中国人民的自由意识与斯德哥尔摩心理 2021.9.4

人的思想行为所包含的中心意识，从第一个跳下大树，用双脚直立行走的古猿，到现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组成部分，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概念，为一种动机所驱使，政权的建立，市场的交易与其他大多数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剥去历史背景与突变，自由意识作为人生来就有的一种观念，在社会的变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存在决定人民的意识，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聚众而活的社会体制结构诞生了，同样因为自由意识，权利产生分化，为了给自己谋取利益，权利演变为强权，当一群人为了私人利益聚在一起，又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实行压迫统治，从而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

把自由意识带入当代社会，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忘了自由与民主二词的意义，当人民被党国政府压迫时，又产生了一种负罪感与斯德哥尔摩心理，中国人民不希望自己自由，不希望开放，渴望被管理，被压迫，被牢牢地锁在属于自己的笼子里。

相较于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中国人民的思想状态显出一种既不允许听也不允许说的的尴尬情况，政府一方面严格管制，精心设计人民每天看到的每一条新闻，听到的每一个观点，一方面又严格控制网络舆论环境，而政府本身受体制运行影响，难以察觉政策和体制本身的问题，又难以及时做动作，导致政府继它控制的人民之后，也成了瞎子，但问题出在政府了解自己，但不了解人民，民众对政府了解的信息又没有知情权。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着斯德哥尔摩心理，上下五千年从皇帝到鸦片到共产党，前两者并未充分利用民众产生的负罪感，而共产党常年的对于国安的舆论宣传一直在告诉人民：控制不住自己是危险的，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意识的薄弱，就此观点，不禁使人发问，为什么要人民控制住自己？自由和自由意识是人类的天性，况且对于民众来说，开放舆论环境又能如何？揪出国家的问题，不会影响社

会的稳定，只会促进发展和进步，对于其他目的的言论，就算严格控制，有怎能控制得住？只在做无用之功。

这种严格控制的舆论环境把中国网民栽成了温室里的花朵，‘网络温室’比社会温室，教育温室更让人担忧，互联网逐步取代社会娱乐生活的当下，没有了自由意识，就没有了辨别获得虚假信息和低质信息的能力，而阻止自己获得这种能力的行为是自发产生的自我约束的心理，这让人感到担忧。

谈中国特色 2021.9.11

二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心中纳粹的阴云还未完全散开，自然生出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敌视，挂着共产之名，无论中国特色还是其他什么特色，都可与纳粹挂钩。问题在于，这个挂上的钩有没有勾到什么，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大国有没有可能因为内在因素重走纳粹之路。

历史由胜者书写，欧美国家当然不希望看到纳粹死灰复燃，近百年的历史宣传中，如果纳粹原本是灰的，现在它已被描成深黑色的，以至于新生的一批青少年对于纳粹的印象是糟糕的。若要现在重建纳粹党，人民路线肯定是走不通的，但是在中国，领导人会很巧妙的运用一些模糊概念的词来代表原意意指不好的概念，把新资本主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团结穷人闹革命推翻现有政府的科学社会主义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所谓特色可以让纳粹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中国特色，即根据国情国力，考虑到国际问题而对现有思想实行过程中做出的改变，大国沙文主义意为大国以力欺小，把自己国家的发展作为要务。后者中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在高效执行，从人肉堆朝鲜战场，到不计人力造原子弹，再到现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无视人民精神世界的建设从而催生出极端民族主义，中共层从不以当下的人民需求与民生作为发力点，一直在为自己的儿孙们铺路建设，不以现在的国家利益为本，以五十年后的国家利益为本，可称作为特色。以大欺小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天朝还是中国，求的始终就是面子功夫，早在周朝就有岁贡之说，只要诸侯来朝，天子就下发赏赐，要的是排场，要的是体面。放到现在来看，台湾就好像贡品，美国作为一个实力和中国相仿的国家还在斟酌到底要不要给中国上贡，还是面子功夫。一带一路更是好面子的极端例子，文化殖民就说成文化殖民，经济殖民就说成经济殖民，用着别人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输出自己不需要的生产资料，在过程中汉化其他国家，并国垄小国民生的

方方面面，从而体现软殖民，也就是中国特色殖民的效果。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殖民是双方都心甘情愿的，而且别的国家还不能直接把殖民的帽子扣到中共头上，以互利之名行渡仓之实。若中美开战，与中国交好的小国就会成为陆上交火的主战场，平时也作为中国的小弟和挡箭牌，这种所谓交往实是压迫。这样中国特色的沙文主义就可循了，特色殖民与特色国利至上。

中国的特色极端民族主义，主要得益于中共庞大的宣传网络，煽动式的宣传激发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又被掩盖为爱国情绪，由最近的鸿星尔克事件可见，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是廉价而又缺乏胆量缺乏发泄口的，鸿星尔克亏损时捐了钱，尽了应尽之事，就被买空买断货。黑人外教杀害女大学生，网上就掀起一股黑人没有好东西的思潮。这又不得不让人回想起 2012 年九月发生的 U 型锁事件。在抗日游行中，一对夫妻去建材城为自己的儿子购买婚房的装修材料，他们用积蓄买来的丰田车被人毁坏，一位爱国青年因夫妻不断的反抗用 U 型锁对着车主的脑袋砸了下去，致颅骨碎裂，而他活在自己英勇抗日的精神世界里，以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把畸形的爱国情绪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出来。可见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到底有多缺乏发泄的机会，将亏损捐款、一个特例、一个国际消息作为普遍的代表与权衡的标尺，强行和爱国靠拢，又在更大的问题上扭扭捏捏，可谓双标。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的宣传出来的，亦是共产党需要看到的，因为最近二十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的指引没有及时跟进，催生了社会问题，而党和政府解决的速度效率很低，舆论方面对于领导人的神化又过于激进，导致领导人的公众形象脸谱化，导致欲爱国却不知从何开爱，敬党却不知党的哪里值得去敬，最终爱党爱国沦为口号，空让年轻人怀有满腔欲撒的热血和炽热的爱国心，却只能从黑人白人甚至企业发生的事情来发泄爱国情绪，这是宣传部门出的问题。那么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就可以理解为建立在国家认同感，也就是爱国心上的对外界的排斥以及对自身的盲目推崇。

对外扩张这件事对于炎黄子孙是个陌生的话题，中华民族始终生活在自然的摇篮里，既不会像欧洲国家一样发生可致战争的全国性粮食危机，也不需要像日本一样迫切地寻找生存的空间，中国人自古就不具备这种侵略的基因，在皇帝的统治下更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空间，但是上面已经说了，中国在近几年持续对外殖民，那么如果有软殖民无法对付的对手呢，航母的作用不就体现出来了吗，还是面子功夫，中共不会明目张胆地去抢别人的土地，而是会借解放之名武统台湾，然后外交手段甚至动武收复其他地域，直至南海彻底中国领海，解放是一个

好词，可以去解放自己祖宗的祖宗曾经占领过的地方，然后硬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或许中共会拿出元朝的版图，然后解放俄罗斯，拿着山海经，去解放北美洲，借历史之名，以强军之理，行侵略之实。不把眼光放长，看即将到来的武统台湾，解放一词已经变味，强军的初衷是保卫人民为人民服务，而军队的强弱却在中共手下变成了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外交口风。民花的钱，让国家在国际上挺直腰杆，本是理所应当，但是如果将来用于解放别的国家，军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初心。也就是说，当武统台湾的进程正式开始，这片大陆上就燃起了军国主义的火星，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渴求的生存空间不同，中国的特色军国主义好的是面子与其他国家的财富、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国特色的党政不分导致了另外一个争议：舆论控制。人民对舆论，或者说是消息，自古都有着获取、讨论、传播的权利。在古代，如果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家的君主很难对其进行干预。而以网络为主要舆论载体的今天，信息饱和驱使着民众自发地渴望获得真实的信息，而不是被加工过的虚假信息。

可怕的是，当一个人接受的信息一直是经过筛选的、加工过的，甚至是虚假的，那么这个人在接受新信息时就会相较于上面的退而求其次，将比较可靠但客观不完全真实的信息当做真实信息。放到生活中来看，一个国家需要让人民了解什么？民生福祉的提高、国家的建设发展，甚至小到柴米油盐产量的变化，这些都与生活相关。但现在民众获取的信息是什么？主要都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国家归属感，但相比于人民政府，可能是党更需要人民了解这些，这些与民生无关，与发展无关，无非证明的是政府实力的增强，恰好利用了人民对党国概念相当模糊的理解，让人误以为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在介绍国家最高领导人时用的都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国家的主席，整个国家还是受团结在总书记周围的党中央领导的，这样的暗示与明示，像纳粹德国街道上挂满的万字旗一样令人作呕。早在八百年前，英国的大宪章就明确了王在法下的体制，放到现在的中国来看，王应该是党，法应该是国，那么就呈现一种王在法上，王即是法的局面，这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一百年之前中国的政体就是这样了。号称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七十二年的历史中有一半时间仍然持续这种无法无理的类帝制，让人无法理解，除了科技和军事实力的进步，新中国哪里新了？

对比国外，有多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会有媒体报道有关执政党的消息，但党的概念被模糊弱化了，领导人和领导班子几年就下台了，不用为自己长久统治的江山而准备，那么国外的消息来源对比国内就更有公信力了，国外的媒体虽都由

资本控制，但网络信息舆论不会被政党所控制，人民了解到的国家是真实的，资本运作舆论也无非是控制选举和对当局的想法，和对国家民生的报道没有关系，最起码不像国内，媒体费时费力营造军队的政府的党的神秘性，让人民被蒙在鼓里，看不到军队的真实水准，看不到社会的问题，看不到党领导下的政府没有做到的事，这也非常非常令人作呕。

党对突发事件大选择性报道，和对舆论的导向操控，不仅在模糊党国的概念区别，也在模糊人民和民族的区别，习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为大陆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民族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很空，因为话术就是话术，人民就是指生活在土地上的一撮民众，民族指的是有向心力凝聚力的一群同根同属的人，那么党的高明之处显现出来了，党不仅说了民族复兴这句话，还把民族真的和人民混淆成一个概念了，人民政府当局和党直接代表了上下五千年所有炎黄子孙的意愿，各种强军强国的论调让网上的青年团结在了一起，以为自己是在为强国而奋斗，实则不然，将来还是要给资本打工一生。这其中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民族主义的具体化，种族主义的火苗开始在这篇大陆燃起来，对国内外黑人白人的负面报道是片面且让人产生片面的想法观点的，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敌视从美国警察美国罪犯变成了白人警察黑人罪犯。这是党希望看到的，在红蓝绿阵营的团结上再加了一层黄白黑的锁，让党的江山有稳固了一些，当现在的年轻人长成中年人时候，都管台湾人叫蛙蛙，管白人叫白皮猪，管黑人叫黑鬼时候，党在这方面上就成功了。

作为人民，可怕的不是对于国家恶为的不知情，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包容、宽慰、理解，以至于自己去宣扬国家的一套，从这个角度讲中共的宣传还是很成功的，把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理论包皮后呈在桌上，让自己的人民信服而无从指责，实际这些行为都在败坏自己国家的名声，蒙蔽了的眼睛是中国人民的，国际社会是看的清中国在干什么的。

不得人和的中共 2021.2.15

一个小团体的稳定来源于其内部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权利与利益分配，以及领导者足够的权威。习近平政府接手国家后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与其成效告诉我们这句话所传达的意思放到共产党那里并不适用，或者说如果一个团体的规模大到有十几亿人之众，对于它的管理和控制要比一个小团体容易的多。

不妨对比一下十年前的国家的舆论环境，政治言论有一定的自由，网民可以支援国家的问题，批评政府与当局的过失。再倒退二十年，仅凭信件的往来与报纸消息的传递就能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们的力量，也比现在敢于发声，敢于指出问题厉害的人的力量要大许多。

自由意志是人生而就有的，黑与白的概念，却是人生后习得的。黑的的可以被涂成白的，白的也可以被描成黑的，这种洗白或描黑对比共产党的宣传手段堪比小儿科，共产党并非如此，它不让民众知道涂不成白的信息，是让民众少看见被描白的信息，的是让民众天天看见纯白的正面新闻，至于黑得涂不出来的，一部分被拒之墙外，一部分被锁死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民众的心理就像一根弹簧，压的越死，弹的越高。共产党用 10 年时间洗净了人民的脑，改变了民意和民心，未来若党国有难。有人把党做过的黑事，灰事铺于光下，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民，就可能会重新选择阵营了。

民心是垒出来的，不是短时间内堆出来的，政府做的越好，人民就是越有凝聚力，但要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人吃不饱饭，没有工作，社会主义下还有资本家压迫的劳动人民。那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夸出花来，也是要终有一天要垮台的

意识形态斗争的预测 2021.9.25

近十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消息传达，信息沟通的速度加快。十八大以后，舆论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中重要的一部分，习近平 8.19 讲话之后，各党媒报道了有关意识形态宣传与争取中共舆论主导性的新论调，并借此开展各方面的舆论斗争。

梁启超曾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中国近现代史中记载的革命如五四、八九学潮都是由学生发起、扩大的，新鲜的思想取代过时错误的思想是历史的必然。故当代青少年所受教育与所感所言，无疑对中共当局政权是否稳定起重要作用，所以青年接受的外国文化和国内的亚文化定会成为当局下一个严加管控的对象。

目前来看，被采取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斗争最主要的手段和十年前一样，仍然是凭空造出外敌和内敌，通过操控信息知情权，利用互联网来操纵人民的情绪，来为当局的动作打掩护，从支持华为，打击马云等资本力量，资本国有化到打击娱乐

文化，这些动作中由国家主导的公众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未成年人没有成型的思想观念，不懂得辨别是非，又在互联网舆论环境中占据重要位置，所以意识形态斗争一定会先从未成年人接受的文化下手，游戏、电影电视剧、动漫、娱乐圈都充斥着历史遗留的不确定因素。

最近，游戏防沉迷进一步收紧，下架一些问题动漫，影视审核进一步收紧。为了防止外部意识形态入侵，国外的游戏和影视作品越来越难在中国公开出版，无形的墙某种程度上隔开了西方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入侵对于年轻人是很有效的，习惯了西方思维，认同了普世价值，以消费主义观念和个体中心理论为人了，社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人，如果未来的社会是由这样思想的人构成的，这将是一个分裂，没有聚合力的集体。这些受打击的新兴娱乐形式有别于传统的娱乐形式，高致瘾性中可以夹杂着能让人潜移默化的信息，这种有很大夹带私货发挥空间的性质增加了不确定性，政府机构的管控效率和灵活性低下，一定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首当其冲的部分。

教育相比这些娱乐形式，可以被国家直接管控，教材和教学内容都是在国家监督下编写的，而文化生活和娱乐生活共同作用于年轻人养成的思维，对其管控只会越来越严。

人权二字，不是中共政府的挡箭牌 2021.10.13

往往在提到国外政府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媒体们会引入人权一词，而人权也往往是西方国家用来批评中共政府的惯用概念，西方国家所谓人权无疑在利用认知差异，不同政体统治下的人民，对自己的权利的敏感程度往往不同，而中国政府用来回击的也是人权，用剑来当作挡箭牌，运用的并非是公民利益、人民权利之类的概念来混淆视听，中共政府给人权下了一个定义，定义它为政府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与作用，作用到人民身上，赋予人民生存权，而并非切实存在的利益，从而掩盖自己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辅以高压统治，让人民忘记了人权本来的意义。

所有上升的主义的概念都可看作一柄双刃剑，好比民主在印度可以成为贪官谋财的手段，共产在中国可以成为粉饰政府面貌的名号，人权也可以被用在好处，就是政府的一套说辞，往坏处来看就是一场对于人民权利的剥削。以抗疫举例，韩国也是民主国家，和美国一样尊重个人权利，为何能抗好疫？自己不力就强调概念的本质，自己做的好就给其他国家打上反人权的标签，让人以为西方国家之所

以无法有效抗疫，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对人权的尊重。而事实如此吗？中国的人口资源大，医生多，劳动力贱，有能力负担起抗疫的医疗任务，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党派之争、医疗水平低下、医疗公司的利益，难以推行抗疫，不管何故，和人权二字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媒体描述的如此藕丝相连。

反观中国抗疫，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二：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剥削与中国人自发剥夺自己的权利的行径，每个人每走一步，每动一下都能被国家监控，国家甚至可以快速统计出感染者接触过的人群，很难想到如果有一天这些信息流落到敌人手中并作他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这种担心或许是多余的，美国人控制着的滴滴打车已经被整顿过了，但真的是让人放心吗，如果这些信息被接手于人民敌对的政府呢？可见的是中国正在走这条路。

舆论的控制越来越紧，人民的思想越来越固化。指出政府的问题之所在，褒贬政府的功与过逐渐变成颠覆政权，反动思想时，极权政府就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回到人权，其实剥夺人权的罪魁祸首或许并非政府，而是我们自己，我们逐渐学会了理解包容，无视政策的问题，这是每一个正在被侵犯的权利却还想着自己被国家所尊重的人的自我意淫。人权不是中共政府的挡箭牌，人权是公民应有的权利，言论自由，个人隐私，政治权利都是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意志便是如此，与生俱来，不可剥夺。

导读《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2021.10.31

收到书以前，以为是本厚厚的理论书，但拿到手里才意外的发现，这是一本 32 开篇幅不长的作品，正如序言中说的：《跨》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立意深远，主题清晰，观点分明，饱含激情。这是一本新书，出版于今年 8 月份，油墨味还很浓，刚看到内容时角色这是一本帮政策打圆场的喉舌书，但细看下来，这本书还真讲出了一些东西。

全书分为财富的欲望，繁荣的基石，撕裂的美国，数字化财富鸿沟，市场神话的破灭，迈向共同富裕六个章节，全书由感而发，从财富鸿沟、先富阶层两个概念出发，逐渐回到本书要讨论的中国人的共同富裕。

行文从新冠疫情开始，作者指出，在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停摆，财富鸿沟加剧，多个政府因此采取宽松政策，恶化了社会财富分布不均，与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由资本而生，伴随着问题的激化，资本主义必将由此被历史淘汰，有关

贫富分化的问题的讨论回到中国，先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经济尝试分化、资本化却并未实现，真正的一部分人富起来从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开始，并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社会各方对财富的性质伦理与责任问题的看法，差距也越来越大，很难形成社会共识”因此建设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着重写财富问题，从历史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目标已经完成，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财富伦理上的认知问题，企业家所积累的财富都是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吗？换言之，财富的聚集主要因为资本家的个人素养与水平吗？企业家有义务行善吗？企业家如果不行善财富会自己重新分配吗？先富带动后富，这一对共同富裕的提炼总结无疑回答了这些问题，“先富群体对自己的财富的处置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有权任意挥霍自己的财富，而不必去考虑他人的看法，他人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也是基于私人的道德选择，不做无可厚非，做了可以获得美名”，富人帮助穷人是社会的基本道德法则，但道德终究是道德，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市场的自我演化需要政府的干预，不只是完备的法规，市场经济无法孤立存在，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政治，这无疑是对自由主义市场学说的中国支持者所声称的类似企业在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慈善，应该由市场本身约束，而不是由政府约束，其观点的最有力反驳，之所以这些观点不正确，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鱼龙混杂，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市场很难自己维持自己的运行，这也是共同富裕应时代要求而生的原因。

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补充，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谓坎坷，来之不易的和平中，中国在夹缝中发展经济。作者随之提出“中国若想从落后的经济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不仅要对抗外部压力，还要对内整合资源”这一观点点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扁平的，经济活动将会是没有生机的、缓慢的，中国不能离开市场经济，但还是要提防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章撕裂的美国中，作者从美国入手，让人看到了，如果政府不对市场加以管控和如果政府对市场加以管控，一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由于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贫困与阶级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处于美国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愤怒与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美国的市场缺乏管理，社会财富单向流动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阶层的固化，穷人的子女只能是穷人，这是一种阶级诅咒，在美国，原生家庭对子女未来的影响比在中国要大得多，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品性、习惯、教养，而中考、高考作为几乎公平

的机制，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比美国的 SAT、ACT 还要平等的人才选拔体系。回到经济问题，由于美国长期实行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的影响，资本不断向少数人的方向积累，政府控制不了企业，企业反过来制约政府，不同阶层之间因此产生对立情绪。为了缓解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绝症，政府介入一次二次财富分配，对社会进行财富调整，从而人为制造了美国的黄金时代，这无疑是给中国正在搞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自己去摸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提供给我们的。

资本生而吸血，资本持有者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的资本，而影响力要更小的民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本就不多的财富不断流向其他人，最终这些财富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里，作者在这里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一种新时代特有的垄断：平台垄断，平台对用户的吸附性和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促使用户成为了平台的资本，平台并以此拉开了所谓数字财富鸿沟，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兴的科技巨头不是产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利用技术优势构建起的独立平台系统的维护者，并由平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软件公司搭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资本开始由实业公司向网络技术公司转移。因为平台的技术差距，信息被集中化处理，并有目的的分配给每一个终端用户。网络与平台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平台被设计的初衷就是垄断，它整合出用户需要的，传递给用户需要的信息，给用户提供一种无可替代的体验与服务，正所谓“平台自己并不生产价值，却开辟了生产价值的新源泉，互联网平台可以无限扩大，而成本几乎为零”，可见互联网是赢家通吃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拉大了数字财富鸿沟，加剧了贫富差距，作者指出，面对平台，国家本有的法律体系和监管部门较为低效，存在弱项与短板，可见整顿互联网是共同富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点出大方向之前，作者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市场为何需要监管以及市场乌托邦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以为的，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约定俗成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会激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一观点有局限性，市场乌托邦的出现就是依靠于国家的管理与强制力，否则市场会将一切资本化，不管市场乌托邦是否完全形成，被压迫和剥削的始终是人民，只有在财富再分配中，政府加以管制，才能惠及更多的市场组成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避免进入市场经济的怪圈，陷身于各种问题的并发症？理论要作为一切的基础，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市场经济带来的阵痛，但我们要

明白道德责任与理想的意义，先让中国富起来、强起来，让资本在中国道德化，然后逐步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动词，它和共产一样是一个目标，打破阶级固化，减少财富鸿沟，干预是市场这些动作，都在为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努力，正如作者所说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经济上的满足，应当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最终追求必然是精神上的——我们应当对共同富裕抱有必胜的信心。

读书与思考，《中国大趋势》2021.10.31

2009年版的奈比斯特所著的《中国大趋势》，作者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向西方讲述了属于现代中国的故事，这本书作为大趋势的以中国社会为原本的续作讨论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革新巨大的社会组成部分忠于作者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找的是一种中国的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看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

全书行文从支柱开始，主要叙述了思想的解放纵向民主体制，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际化文化与科技发展。作者把解放思想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因为中国之所以之前闭塞而难以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同国际沟通交流，固守自己的制度与成规，而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全面解放打了头阵，当从经济开始富起来，与其他国家沟通起来，随之带来的便是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解放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需要政府与人民承受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但这种痛并不是由部分人民承担，而是由所有中国人一起承担，政府在其中寻找痛点，企业在其中摸索出生存的道路，进行自我革新，同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中国人的桎梏-精神的枷锁。

作者称，中国的管理体制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竖向管理，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恰好达到了权力与权力之间的最稳定状态：规矩与和谐并存，在中国，民主并不被定义为人民有权利选出自己的领导，或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同时担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下层人民向自己的上层领导提出问题，领导向上级提出解决自己不了的问题，一层一层的向上传递问题，最后中央来解决，由人民提出的或因人民而生的关系国本的重大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行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放在当

年来看，这话似乎是正确的，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行政能力，连这样基本的中国式民主都无法完全实行，但现在政府的执行力强了，反而迎来了一位独裁专断的领导人，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政体的问题，一个人的权利容易集中，高层闭塞，不开放选举也不给人民罢免权，故中国社会需要民主选举这样一个最后的保险，相比西方，竖向民主更适于现代政府，也更适于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之后是民主与解放两颗种子种出的大树-经济，30年前的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改革开放后，中国这片森林就变成了允许树木自由生长的乐土，政治的解放带来经济政策的放宽，政策一旦开始放宽，人的私欲就开始接管市场。个人目标都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困落后，市场和财富的改革再分配，同时重塑人民的价值观，科学知识，因为这两个概念能赚钱。经济政策的大举措-特区的开放，外资引进的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管理概念引入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带来思想和文化的解放，作者在这里指出，在一个更加重视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中，整体的和谐更为重要，政府应了解应该给人民多大的权利，自己应该保有哪些权利，在尽可能开放思想开放市场的同时，管理市场秩序，反观现在10年前的政府，尚知德隆这样的垄断公司危害社会，现在在一步步的收紧舆论管控，知识理论束缚于道德的情况下，资本的发展竟不受国家的控制，市场管理部门就像僵死的老人，对资本的控制的动作极为缓慢，市场嗅觉也不是很灵敏，直到资本要动国家的蛋糕或动摇国本时，才采取一些行为，这难免让人担忧。

作者同时提到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能自己积攒经验，随着路走得越来越远，经验一步步积累，中国国内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好，外部世界也开始逐渐留意中国的经济潜力与机遇。

这本书还讨论了其他问题：技术、文化、国际化，可以看出中国的路不是走了多少，而是刚开始走自己的路，作者说，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至于如何实现，中国人和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

再看薛兆丰《反垄断的罪与罚》2021.10.31

第二版的《经济学通识》中，六篇经济散文被独立出一小节：反垄断的罪与罚，其从经济角度陈述了作者的观点，垄断是市场发展兼并的正常结果，反垄断不是

不该反，而是政府不会反，也不能完全或正确界定什么是垄断，阻止企业所谓对市场的滥用，实际上是政府在滥用自己的市场管理权利。

行文从微软开始，作者指出：微软作为行业垄断企业，所赚取的利益都是它自己创造的，微软用市场约定俗成的巧妙的定价策略，扩大了自己的用户群体。然后作者的思路转回国内，给认为中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可以维护市场秩序，解决经济的问题的人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指出经济学没有给出对行业垄断的明确定义，政府又难以细化管理标准，从而合理使用管理权，这会使反垄断工作的难度无限增大，作者最后给出颇有老子思想的“不要管、不要问”的解决方案，让市场自我调节消化革新。现在来看垄断企业大可以分为两种：产品垄断、行业垄断与投资垄断，前者很难让人害怕起来，人民不怕微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并不高，而且有实用性，还没有提价的空间，再加上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并不是非常健全，有很多人在免费用着微软的商品，而微软也不打算追究，所以这种垄断反而并不比洪水猛兽，软件产品的加价空间不大，没有了软件，人们的生活也并非持续不了，相比之下，如早已崩盘的德隆，如日中天的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更招人讨厌，对市场来讲也更加危险，腾讯通过投资控制了不同的行业，拿出资本即可买断市场的垄断资格，不管将不将其用作正途，都让人感到不安。

引用原文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惩罚反垄断这么难？因为垄断者往往在垄断行业产业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潜力，整合了市场，使消费者的体验大大升级。消费者自己不愿意承担反垄断带来的结果，政府也不愿意。像这样一个需要发展不计成本的国家，政府放任企业损害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利用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来孵化新的企业，要强行拆分腾讯，政府随时可以这么做，但承担相应结果的就是腾讯的股民，腾讯的产品用户以及腾讯投资了的企业。

由此可见，薛兆丰的文章中提出的放养方式放到现在好像行不通了，腾讯的资产既不是操作系统的知识产权，也不是卖什么软件得来的合法收益更不是生产的每一件实体商品，而是每一个用户所组成的潜在资本，和腾讯控股的每一家公司。它跳出市场直接用免费与整合来捆绑住用户，这令人感到担忧。

薛兆丰有关垄断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把腾讯这样的企业算在考虑范围内，蒙牛、福耀、华为的垄断不用去管它，需要管的是腾讯的真正意义上的垄断，面对这种资本，国家不应继续放任，试图给他刮骨疗毒，整顿它身上出现的小问题，而是给它五马分尸，整体换血，重组资本，使资本在国家的管理下运行，回报社会，

做更多有益的事。

精神赤贫者的爱国 2021.10.31

我想爱国，但不知道从何爱起，我爱国，但不了解爱的是什么东西，这种精神上的赤贫，指的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不了解自己的立场所代表的是什么。往前数十几年，中国刚刚通上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连接刚刚建立起来，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情绪无从发泄的愤怒青年们有了互换观点、交流的机会，很多人被了解到的消息，接收的信息所鼓动，并没有从精神上，而是跨越意识形态，直接把自己的情绪借爱国之名发泄出去，这是爱国吗？缺乏知识，但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原始的行为是最纯真，最真实的爱国之情，为此闹出的许多笑话与故事，大可当做一个时代的标签，虽然没有理论知识，仅从砸日本车、抵制外货的行为，可以看到愤青拿中国当做一个利益整体，把自己当做个体的这种的集体主义思维。往往愤青并不感觉自己的内心很空虚：今天砸了两台 toyota 车，偷别人买的进口商品扔到垃圾箱里，很充实。

显然爱国愤青并不属于所谓精神赤贫者，那么什么样的人能算作精神赤贫者呢，被拘束了手脚，丢失了觉悟，被生活打灭了热情，疲于奔命的愤青们就是这样，网上青年们用键盘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给煽动性的信息复议，在洗脑的视频下刷屏，他们一方面仇视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一方面精神又极其空虚，宁愿接受洗脑，也不愿意去多读一本书，多了解一些概念，多了解一些理论，一方面又自发的维护着不该被维护的群体的利益与声誉。问题真的在网上的愤青身上吗？不完全是的，这些人在四五十年前叫红卫兵，在几十年前叫五毛，现在叫小粉红，不同时期的无知青年都容易被煽动，从而占到大众利益的对立面。

相对于青年容易被煽动，也容易被策反当无知者，当中国青年学会抬头睁眼看世界，开始明白政府侵犯剥削，他们本来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利的管理和所谓的大方向的要求，正在给他们的未来铺上路障，或许他们又会调转枪头。也可能会有人继续坚持支持暴政，因为有人即使有机会接受新思想，也不愿去自我革命，这就是精神赤贫者的爱国。

个人崇拜是人民民主最大的敌人 2021.10.31

迄今为止，民主仍是人类社会最高效的政治制度，正如俞可平在十几年前所说的，团体的领导人经个体之手上台，经个体之手被罢免，或者按期下台，十八大以前，中国一直实行一种竖向的本土特色民主制度，权力呈金字塔状集中，但塔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团体内个体作出决定的，另一个象征性群体：中国共产党，权利的执行能力则按倒金字塔状分布，行使领导权的，并非任何一个个体，一种新的思想，一个方针，一个目标，却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内的决策人民无权插手，所以这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党也并非每时每刻代表人民的意愿与利益，这可以叫做“亚民主”。

但习上台后，中国本就不完全的民主逐渐向专断独裁靠拢，每一个政策都是习起草的吗？每一个方针目标计划都是习提出的吗？新的思想思潮倾向尽然是一个人的成果吗？未必，但宣传不断的把这些归功于其个人，冠以其名号，让人以之为领导力，不管是党内是否真的存在权力角逐，习的地位是否稳固，人民看来，习个人的功劳是最大的。

党控制全国各级政府的人事变动，像寄生虫一样把触手插进国家的命脉咽喉，民主选举的制度已经因此不完全了，习的个人宣传、修宪更是直接宣告中国不再有民主，猪狗羊马，前提是听话的猪狗羊马，有机会进入权力的中心，无能的人被党任命，权力从党自己开始腐化。

为什么宣传一下，大家就开始崇拜个人了？中国在初行民主制度时就走了错路，中国老百姓有一种官本位思想，导致了对权力的盲信，中国刚开始实行民主时，没有确定出党内的民主制度，主席由党内不同势力纠葛而生，党的外在形象表现得太过依赖于最高领导人，这种本身就建立在独裁本质上的民主，随时可以因领导人的私欲而名存实亡。

个人崇拜是人民民主最大的敌人，如果一个国家都团结在个人身边，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奋斗的目标，那么民主就不复存在了，政府就成了人民霸权的棋子，成为了执行指令的工具，成为了领导人的傀儡，而现在中国大有向此发展的趋势，这令人感到担忧。

金权是社会平等的最后保障 2021.10.31

几乎所有日常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只要给足够的钱就能轻松买到，因为必需品的

供量对于个人来说几乎接近于无限，但对群体来说，任何商品都有供不应求的一天，所以面对消费者，所有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有一个定价，一个商品有了价格，就有了买不起这个商品的人，这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种不公平？金钱有许多买不到的东西，权力、生命，有时钱甚至难以生钱，这对于有钱人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寒门尚出高官，农民上大学的也大有人在。

财富，必然是，富人用什么东西换来的，健康、良知、人身安全，有了钱就有了用钱买不到或买不起的东西，这样一来，必需品中有的穷人买不起，非必需品穷人不敢去想，字面看来，穷人和富人的生活质量似乎天差地别，但用理性去想，而不是下意识的分出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来理解贫富导致的差异，不难看出，富人的一部分会变成穷人，穷人的一部分也会跻身富人，有了钱就产生了不公，为了抵消这种不公，无论历史上的哪朝哪代，或者还没有产生文明的原始社会，都有一套让穷人不始终贫穷，富人不始终富裕的机制，从察举孝廉到科举，到后来的农民当皇帝，在这里，金钱等于权利。

为什么财富有时买不到权利，而权利约等于金钱？重农抑商时有了权才有了暴富的机会，若有了钱，富人可以钳制政府，或自己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权力、金钱是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催生的，在中国，这种转化经常是单向的，那为什么讲金权是社会平等的最后保障呢？第一，钱不会看脸，富人用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与穷人用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并无差别，好比一吨羽毛和一吨铁的重量差别，虽然攒出一吨羽毛比一吨铁更加费事，但他们所代表的重量，一吨就是一吨。其次，社会给了所有人平等得获取权力，从而获取金钱的机会，主要是在金钱和权力之下，已经基本实现平等的人才选拔机制，高考的考生们，有的可能因为家境接受了不如富人子女接受的教育，但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个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赶上比自己接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人，这不是让已经被资本垄断，被政府施以威权，马太效应加剧的中国社会看起来更加有希望，而是切实的提供了一种直接跨越鸿沟，固化阶级，消除差距，出人头地的方法。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为什么出身比其他人低就要努力去追赶，第二，除了高考穷人还有什么方法变成富人，之所以认为金权是社会平等的最终保障，是因为钱买不到高考的成绩，而钱也不能凭空得来，祖辈积下的产业，偶然发财得来的财富，都需要有基本素质才能把握。学生并不用去学成功学，经济学，社会学，经营学，仅用书本知识进行二次发挥，就能在考场上打败富人，用更大代价换来的财富，这里假定十年寒窗的成本要小于得到财富的成本，而实际上在中国大多情况下都是这样。这样看来，高考仿佛

是给穷人设计出来的，几乎与富人所走的等宽的捷径，只要不抱有认为出身，导致需要自己加倍努力，而不是自己努力一点竟能比富人活的一生还有意义，这样的唯心观念，教育就可以看作理论上为每一个法律的平等的人设计的快车道。

那么高考和金权有什么关系？因为世上已经有钱这种东西了，有了钱就有了贫富差距，完全除去金权是不可能的，高考这样的机制是在变相维护金权。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社会还给穷人准备了什么捷径？几乎没有了，高考选出治国，科研，军事，管理上的人才，分配给国家，军队与企业，穷人被富人需要的情况，只有穷人有被利用和压榨的价值，与穷人有挥霍自己本就不多的财富的习惯。只有高考作为中国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的结果，最为详实可信，有用的穷人才有机会变成富人，古来如此。

金权将财富转化成社会地位、权利或者其他形式的财富-无形财富，这些财富除了权力本身几乎都可以直接用钱来买到，所以保障权利与保障平等，最终还是同理的，高考就是对金权的重组和再分配，同时金权为了维护自己内部不出现鸿沟，百姓不视金权为洪水猛兽，它就还能维持自己，并制约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维护高考的公平性与权威性的另外一股力量是金权，它用高考来让自己有机会重组，可见金权是社会平等的最后保障。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2021.11.21

如果一个人没有见过更好的生活，享受过更好的权利，处于过更高的地位，他就能忍受被剥削、被压榨，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着的，但当他睁开眼，看到自己身边比他更有地位的人的生活，他就会期待着，盼望着自己能够活得更好。

大多数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由学生发动的，原因基本在于学生地位与话语权的提高，与青年所具备的中老年人所没有的灵活的思想，如果秦朝的学生数量够多，不受礼教约束，起义的或许不是陈胜吴广，相比之下学生这种灵活的、适应性强的思想，恰好与中老年人安于生活，疲于生计的逆来顺受相反，因为青年正处于学习期，每一次新思想的洗礼都会引发一场震动，这种震动极易被引起，也易被平息，这就让青年成为了最被易煽动的群体。

但易被煽动并不意味着青年是非不分，如果青年群体不被有目的的人引导、利用，像五四运动一样，他们的目标会是大体正确的，况且是非是由人定义的，是给人

看的概念，五四运动中学生们要求的、争取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领土主权完整、惩处国贼。并以此为有组织的运动，从出发点看，这是相当正确的，正因学生能被煽动起来，他们才能自发的组织起来，也因为他们同时具有着理性思维，五四运动才不会跑偏，反观后来的文革，八九民运，相比之下五四运动可谓是最合情合理的一次。

五四运动的成功埋下了种子，才有了后来两次学生运动的幼芽，中国青年在百年前被煽动起来反抗政府，为什么在三十年前，学生又以几乎相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再次革命？是中国的青年一直在躁动吗？很明显不是的，五四运动所留给人们的好比思想中的一堆干柴，如果生活安逸，它就与一块石头无异，但一旦有一颗火星，这堆干柴就会燃烧起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之前说过，中国青年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精神，真的如此吗？并不是中国青年心中的那堆干柴被挪走了，而是现在的社会擦不出一颗能把它点燃的火星，而相当一部分青年正是这一现象的元首或帮凶，那堆干柴始终还在，只是现在的政府难以把它完全从教育体系中剔除，这种革命精神体现在历史书中，体现在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中，也在每一位了解五四的青年心中，我们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但这里的革命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历史书只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过一次革命，而不是怎样革命，革命有多难，革命成功了会怎么样，这让中国青年忘却了革命本身，忘却了中国是由革命而来，忘却了中国最后也会因革命而去。

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即使没有环境，中国青年也该秉承百年前的革命精神，政府不利社会出现问题积弊，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就应推倒重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种魄力和说真话，说实话的勇气是中国青年所缺少的，这也是五四运动要告诉我们的。

教化的力量 2021.11.27

古代的君主要比现在政府的领导人高明多了，因为他们明白‘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并不指现在中国的党化教育，而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手段，对被统治者施以思想上的专政。我们不妨看一下现在的党化社会，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哪里来的这么强的奴性？大街上你看不到插在各处的红色旗帜，也不见有坦克和军队巡街，更没有什么骚乱与暴动，这是现在的政府袭用了老祖宗的遗产得到的结果，写在儒家经典中的孝、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上级服从下级的观念，在

人学之后会潜移默化地化作一条铁链，捆住了人的思想，这可比成天喊一句口号要有效得多。

人总是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被灌输某个观点。这说明教化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与其让人背出答案，不如去让人了解解出它的过程，之谓‘受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习再多的政治概念，也难以动摇本有的思想基础，但如果让人了解历史，在历史中一步一步的看到国家、人民是如何衰败，又一转看到了国家的富强，从而自己得出一个爱国之为，行之有效的结论。

有了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教化，党化教育可以停止吗？这是万万不可的，一旦党的地位从人的心理开始边缘化，脑子就取代了屁股，人就开始从民族的劣根性、文化的劣根性、历史的偶然性这些角度来进行思考了，不给出路线，不强迫人以党的路线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党最不想看到的。

抛开这些，教化有何作用？这就要先问一些其它问题了，比如为什么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转型为独裁主义、威权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世界上的真民主国家越来越少？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推行都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些问题的原由都可以归结为-教化的不足。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生产力不足才无法持续发展吗？因为人会偷东西，抢东西，会偷懒，会拖工，这破坏了可持续的生产活动，从而导致生活必需品与其他消费品无法供足社会需求，在原始的农耕社会，一户农民进行生产活动，能种出足够全家所用的粮食，放到现在来看，一个社会如果运行良好，可以用较低的生产力养活很多人口，问题就出在，偷懒、拖工是要产生成本的，所谓‘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就能使整个社会发展发生大变化’，是在用物质生活丰富来偷换社会价值观变化的概念，这无非是在表达：如果不用人来种地了，都用上了机器，建起了工厂，生产者偷懒拖工产生的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私欲却是无限的，用提高生产力来填沟，此举可称治标不治本，除非另一种情况出现：突发的技术革命，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革命会是带有政治性的，当技术发生革命，而资本没法控制生产，新生的生产系统会被政府完全控制，当这种情况下的社会中本来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再劳动，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就被彻底剥夺了，现在中国人的政治权利已经被剥夺殆尽，如果发生了技术革命，

生存权也会由政权接手，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样一个威权社会会是什么样的景象。那么要想不施以极权，也不等技术革命，何以让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教化。

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是思想教化不足的典型，虚构出的政治乌托邦则给人想象的空间：主权在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每一位参议者都接受了足够的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参政必需的素质，如果教化不够，民主共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那么以接受了教化的人民基础建设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体制本无优劣性，有优劣性的是文化、民族性和国民性，共产共治的社会未必优于资本社会，资本道德有序、政治民主的社会也未必优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的路线对国民素质的要求要比资本主义高，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是‘道德社会’的假象‘有德’说的是人，不是一个政权或一个政党。真正的道德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会以个体的素质在二者见取舍，这样看来，历史终结论不无道理，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素质的人民必然会以普世价值：平等，自由，民主来塑造社会。

中国青年的消费主义 2021.11.27

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在于货币的流通，流通产生流向，流向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谈到经济结构，我们总是抽象化地把平民手握的财富整体化，认为平民的财富累积起来权重较大，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种整体化让人更方便地理解社会思潮对经济的影响，穷人的想法是最好左右的。

侵略最好的方法放眼长远是文化侵略，但要想短期受益，就要像成吉思汗一样直接掠夺。西方的金融家在富起来的这十年中持续向中国输入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玩过的资本套路，股票，虚拟币，传销，网贷，当中国人的金钱意识已经成熟，懂得骗钱的骗局长什么样时，西方才祭出消费主义这种有问题的价值观。

中国的上几代人都是从贫穷中走来，在贫穷中去的，手握财富的这代年轻人亟需

改变自己的处境，可见中国有最适合消费主义生长的土壤，那消费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病入膏肓。生活中随处可见病态消费产生的现象，直播打赏，奢侈品，价格高的服饰化妆品，随着这些消费额占比越来越大，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是谁把这么多钱花在生活的非必需品上？

穷人，或者说恰好夹在有产者和贫民之间的中国青年们，他们一方面厌恶贫民简朴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追求、渴望让人感到享受的生活，而他们手里的财富又不足以让自己过的更舒坦一点，只能去支付相比自己收入较高的钱，去换取一种病态的享受，和更大的生活压力，以及还不完的贷款。中产阶级呢？如果他们选择把自己的钱花在追求更加轻奢的生活上，增加的是中国的消费力，其他有产者都是如此，他们会变相地把自己的钱重新投入社会，而不是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所以穷人的消费主义，才叫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发展有何影响？首先受到波及的会是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的下降，比如追求外表的女性，花着不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钱，买自己不需要的或者可以降低成本的化妆品，奢侈品，让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更加依赖男性提供的消费资源，虽然这是一条从无产化有产的捷径，但在女性向男性出卖色相，换取财富时，女性已经被自己物化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更加畸形的婚姻观和恋爱观，女性的观念越发向财富靠拢，男性就越难负担起婚姻的成本，即使勉强负担得起，生育又成了问题，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各种贵族式教育，价格高昂的辅导班让国家掏钱的义务教育显得无足轻重；随着社会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抚养儿女的作用会逐渐消失。当性需求的问题被解决时，消费主义会导致两性社会隔离的和生育率的下降。

消费主义作用在年轻人身上的另一个效果是榨取所有年轻人的空余时间和空余劳动力，所谓防止年轻人“躺平”。更高的生活成本，迫使年轻人去赚钱。但从现象反观原因，消费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如此，一大原因就是年轻人的“躺平”，996、715、末尾淘汰制、军事化管理、KPI考核这些压榨手段，加上越来越艰难的求职，越来越高的房价和超前消费观，让年轻人的幸福感下降，马太效应产生的鸿沟，让年轻人渴望富人生活，奈何自己能力有限，只能用消费去获得享受，这种病态的循环有没有可能取代常规消费，来促使下一代组成的社会的经济运转，

令人感到担忧。

消费主义不是社会发展产生的，是被不同的意识形态裹挟带来的，年轻人要学会理性消费，学会由奢入俭，学会存钱，才能培养正确的消费观，为了自己而活。

谈一党专政：统一中的分裂 2022.3.2

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其规模越小，能行使的公权力往往越大，由参政党派占席组成的国会议会，做出的往往是多个而非统一的决策，而把一党执政行使权力，在野党提出异议这样的机制，简化为由一个统一而不分裂的政党来完全负责权利的行使，是一种把多头政治化为寡头政治，把被分割的权利重新统一的过程，行政效率无疑被提高了，但这种一党专政的领导方式如果受内因外因作用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议会中的各党派代表成员，首先要代表的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政党为了博得更多选票，在对面向选民‘顾客战略’中会选择性地代表某一部分选民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议会的不同参会者分别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并不代表除自身外任何群体的利益，而是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多党制下政党为群体‘代言’，代表不同群体的各种利益，而这看似空头的‘代言’，要比专制政党的‘保证’要更加有力，我们不妨在此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政党诉求和平，不打算对外发动战争，而另一个政党则坚持要发动战争，那可以说前者放弃了军工企业和资本的选票，而后者则放弃了所有战争受害者的选票，而在一党决策的情况下，当局必须在发动战争与维持和平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形势做出反应这一过程就已经脱离了其人民，因为一党独大的政府模糊了权利机关中建议者与决策者的界限，执政党会作为一个政党来站到政府的角度决策，这种决策可能并不利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有益于‘国家利益’，而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与哈耶克所言‘集体主义社会的形式公共利益’相差无几，这种‘大众利益’并非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诉求，而要想使成规改变，必须先要牺牲，这也是集体主义与寡头精英政治的一个谬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互换是不对等的，这就造成（政治上）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的诉求与‘大众利益’的要求相悖，在政权的决策层却没有人为之发声，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相当多的‘政治弱势群体’，比如不计代价发展下

生活压力倍增的毕业就业者，保守政治环境下的诉求民主的反对派，在国家纵容下被歧视与遭到不公以至被压迫的蓝领工人，他们失去了发声的资格，在权利高层也没有人原意为其发声，他们是政治博弈中被牺牲的一部分，象牙塔中的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些的。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个政权中有着多个政见不同的政党重要性。有政治多元性的民主政治体系，往往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做出不利于民的决策的可能性。

一党专政的局面往往在民主化程度较低，宪政法治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出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是出现一位独裁者，以之为主体，还是有强权人物伴随着强大的政党出现，则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相关，中国是人情社会，故建国时突出党的地位而非领导其人，打仗时中国人宁愿寄希望于一支武装力量，也不愿信赖依赖某一个军事家，某一个领导人，而和平时期则愿意相信是一个人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这是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的效用，而西方欧洲国家的人民在危急时刻选择去相信一个人，因为他足够出色，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的体现，而如果一党专政的局面出现，执政党就会巧用这些文化基因，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上个世纪的中共当局凭空造出‘走资’的敌人，让所有人误以为其正处于思想腐蚀的危机下，这就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政治迫害，可称之为有团结性统一性的和平动乱，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做法被流传下来，党的喉舌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渲染成敌人，把其他竞争国家宣传为祸乱的根源，严禁一切不同的声音存在，却忽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

‘党化教育’、‘红化教育’之余，我们应该想想其后果，事实表明，这种高压统治对内从严的政权往往存续不了多长时间。从僭主到民主是一次对国家和民族的考验，民主化的过程是对国民的再教育，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历过独裁统治，但这些国家都通过了民主的考试，唯独中国经有七十年的独裁统治，国家仍然可以维持运行，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与古代皇帝留下来的积累了上千年的统治经验，但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冲击下，有了这种高效获取信息的方式，中国人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我们应该向台湾学习政治多元化，向香港人学习民主政治意识，向韩国人学习抗争精神，当真正有一天，中国看懂了这些，世界上就会少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多了一个消失的典型。

多党制民主政体如何嫁入中国 2022.3.4

中国人讲‘以和为贵’，也讲‘百家争鸣’，前者展现出了一种社会的包容性，不同意见者相互尊重、和平地探讨问题，后者则借一段历史时期告诉我们，多元思想的碰撞，往往能擦出不同颜色的火花，这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思想民主’，而有别于学阀统治，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鲜有后继，孔子其人生平清寡，他的理论却持续影响中国社会千年之久，并把中国人驯化成了无怨的羔羊，韩非的理论则把中国社会塑造成了一个利己而非利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中国人有如此的文化基因-平民之间不团结，统治者需要把人民对国家的情绪转嫁到他们彼此身上，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对待平等的彼此时从不手下留情，面对强权时却少有怨言，这就给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极权国家提供了无比优良的先决条件。

早在数十年前，一位领导人就利用这种条件缔造了一个集权国家，在其统治时间内，领导人利用所有的手段来为自己攫取利益，正因如此，中共当局做出了许多错误决策，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导致了经济与民生的大衰退，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党执政的政权中其宪法、监察机构与民主权利机关组成的面向权力的防火墙，不过是一层用手指就能轻轻戳破的窗纱纸，大量的事实也在证明，一党执政、集体主义和与中国有类似的文化基因，或在历史上有过封建统治的国家，许多都在现代化进程中转型为极权国家，这让人不禁担心起中国的未来或许正在重蹈数十年数百年前的历史的覆辙。

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制民主往往被宣传为一种低效而分裂的政治形态，正如百家争鸣，百家之言，总比一家之言强，被多数人所同意通过的决策，如果推行就示意着，这个政策已经尽量做到贴合更多人的利益，而违背最少人的利益，而一个政党未经协商内部做出的决定，可能只服务于政党自身、政权本身或某一个利益群体。回到问题上来，多党协同决策、一党执行的多党制民主适不适合中国？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不应从这一制度在中国有没有可行性来看，而应反观历史，建国至今已经有七十年，有三十年间，中国全国都沉浸在建立集体主义社会的幻想中，在这期间党的领导下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破坏社会稳定性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后，体制则因为政府的自我监管不力，导致贪官污吏横行，

‘官倒’破坏市场秩序，逼得百姓上街游行，二十一世纪到来后，由于对市场的监管机制不完善，德隆等一系列资本集团的崩盘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亏空，对市场经济资本管理不利，导致现在的工人待遇低下、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倍增，因为社会治安体系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中国有数十年中都处于社会动荡不安、治安状况极差的环境下，现在发展刚有起色，就被渲染成了党与其领导人的功劳，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力与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完全可以将发展时间缩短成一半或更少，因为执政党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导致建国后一半的时间，中国社会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由此可见，一党专政能在这样一个国家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要想让中国建立民主政体，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体来避免让中国成为民主的‘坏学生’，我们可以模仿美国建国的过程，美国宪法的第一部中一字未提民主，而明确阐明其建立的是共和政体，比起主权在民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共和则更像现在中国的政治形态，但却与之有本质的差别，一是共和的形式，要想让社会平等，就要保证作出的决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了，无民主过程，哪来的共和结果；二是平等的定义权被掌握在国家的领导人手里，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党说你是人民，你在政治上就正确，说你是人民的敌人，就对你施以专政，如果党在做出某一个决策时侵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一部分人又试图反抗这一结果，那么他们就会被党定性为人民的敌人

要想在中国建立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就先要明白，在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全民主体制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做法是在该共和的地方统一决策，在该民主的地方民主投票，还应该建立一个独立运行于政府之外的监察系统，不要把权力关进窗纱纸笼里，而是真正的把行使公权力的人与机关隔离于其他可以造成不利的因素，这样才能让机关健康地运行，民主的普适性也才能有所体现，而非空挂虚名。

中国社会劳动力‘自我逆淘汰’乱象 2022.3.4

如果一个人完全投身于集体，成为了庞大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那么他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个体的特征，为社会贡献得到的回报也仅仅是给部件涂上的机油-增加部件的使用寿命，如果这个部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满，那

么操作机器的工人就会将它摘下，换上更便宜、更容易维护、使用寿命更长的零件，可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竟然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而现在大多数的中国蓝领白领都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或已经变成上述的‘机器零件’。

中国现在每年有将近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加上双考淘汰的一部分，可以说每年中国都会多出将近两千万的劳动力，以常识来判断，中国社会几乎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劳动力消化量；举两个亲眼所见的例子：身边一位女士的儿子在本地的一所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向其母要钱，在他就读的大学旁边开了一个小卖店；也是另一位大学毕业生，常年处于无业状态，其母私下打听，找到了本地市政系统内的一位领导，试图向其行贿三十来买得一个科员职务，前者选择了自力更生的道路，而后者则选择用钱买来编制，这买科员职位所花的三十万元在机关里，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可见这是一种‘为了工作而工作’的矛盾心理，这绝非个例，耳闻的三四线小城的毕业生都已至此，全国其他更加富庶、教育更发达的城市，毕业生的工作压力有多大？可见一斑。

不只是毕业生有这样的生活压力，几乎大部分我国蓝领与白领工人也都面临着工作压力，近几年不再见有人用‘知本家’这个词儿了，因为人们看到，随着大学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在就连底层的工人也能随口谄出几句诗词，知识已不在成为就业问题中重要的一环了，没有知识、素质较低的人口却未被社会淘汰，因为更低的工作要求，足够的劳动力来源才是现在生产业所需要的，又何必雇佣一位懂得为自己维权的大学生，而不雇佣需求更低、更有压榨空间的底层工人呢？机器的操作可以简化，生产的流程可以加长，细算下来，还是雇佣低素质的工人来进行生产作业成本更少，而有一定知识水平，但要求更高的大学生们则被从事脑力劳动的行业吸收，他们中极微的一部分向上跨越了一步，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毕业生都逐渐在 996、低薪水、高负荷工作的轮番打击下失去了锐气，这些劳动者又分化为了两部分，一半离开了脑力劳动工作岗位，去送外卖或者做服务员、干流水线，另一半继续进行脑力劳动，把自己的健康、时间付出来换取薪水，又有一小部分人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吃上了皇粮，而不论工作性质是什么，工作要求有多高，所有的就业者不论其身处岗位是什么，都肯定有人是挖空心思在争取的，这就应了那句话‘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中国现在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一直在加剧，但剩余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一直在加剧，但生育人群过于庞大，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这就造成了上述的后果，既要减速人口老龄化，又要让社会一直接纳多出来的劳动力，如果站在发展的宏观层面看，这似乎没什么不好的，市场被垄断会导致商品的价格无节制得上涨，而过剩的产能却能把商品的价格压到最低，但作为一个个体来看其所处的社会，似乎看不到一点社会的影子，反倒更像发展过饱和的金权社会，这就是‘乱象’。

我们进入正题：低要求劳动者淘汰高要求劳动者，是不是应该称作‘正淘汰’？何来‘自我逆淘汰’一说，这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了，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有社会形态、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是因为其个人主义给予了人才足够的尊重与优待，让我们带入中国社会，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人口的一大部分都并非人才，但可能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埋没在了人群中，这些人才被社会的再教育磨平了棱角，消掉了锐气，后‘泯然众人’，这正是人才们在‘自我逆淘汰’，这是一种报复性行为，如果不提供给人才成长的空间，不对他们抱有尊重态度，造成的社会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难道不是人才的劳动者就没有逆淘汰现象吗？一忍再忍，委曲求全的忍让后，蓝领白领们会发现自己为了不被工作淘汰，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的下限，那劳动者的下限在哪？一个商品的最低价就是成本价，没人会做赔钱的买卖，但是人力可没有成本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工资甚至低于国家的最低保障，这种工作很明显是不对等的劳益交换，但劳动者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试图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还在一味突破自己的下限，这就是‘自我逆淘汰’。

中国如果不解决劳动者的待遇问题，‘中国制造’永远不可能变成‘中国创造’，社会不应只靠吃皇粮的老人来推动，也不应有籍籍无名的被压迫者来推动，而是由每一位有自我意识、自主精神、懂得进步的劳动者来推动。

俄乌战争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2022.3.6

上个世纪的苏联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中，苏联因为滞入战局而消耗了国力，

经济几乎被拖垮，因为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油价跌落，苏联赖以生存的石油出口贸易油水骤减，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苏联财政陷入了危机，从而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可见苏联经济有着极强的对外依赖性。

这次的俄乌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开端相差无几，问题出在这场战争如何收尾，这将会改变既成的格局。现在可见的是，不管战争是以俄方获胜还是乌方获胜收尾，俄罗斯面向欧洲的战略纵深都将会被北约进一步压缩，如果俄罗斯像阿富汗战争一样选择撤军，俄西方的战略缓冲地带就会消失，俄将会直面北约，这在对于之后的战略部署及其不利，如果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全境，那么俄领土会和更多的北约国家接壤，东欧格局又会变回冷战时期的苏联北约对峙状态。

美国和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对俄的制裁，前几天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关闭了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用其手段了，2014 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就曾把俄罗斯踢出此系统，因此俄罗斯 GDP 锐减了一半。把一个国家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不能再用美元、英镑、欧元等国际货币进行贸易，这对于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如果俄罗斯不能再和西方国家进行跨币种交易，因其经济支柱就是出口资源，俄只能和中国进行贸易，而中国目前的石油产量大概有三亿吨，年进口量在五到六亿吨，每年从俄罗斯方进口石油三千万吨，天然气产量有两千亿方，每年消耗大概三千五百亿方，从俄罗斯进口四百亿方天然气，可见中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是很高，而俄方的资源出口获利则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战时增储自然资源对中国并无益处，所以俄方只能低价向中国供应自然资源以维持经济，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援助’，低价购入资源中国一定会欣然接受，而战争结束后不论俄方是否赢得战争，西方国家都会减少对俄资源进口，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纽带会更加紧固，新的战略格局也会把两国的战略布局绑定在一起，可见的是：中国虽然军事上没有参与，政治上已经参与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军事对峙的‘新冷战’。

如果俄乌战争最后以俄方获胜收尾，受到俄罗斯直接威胁的沉睡的北约会被唤醒，美国将会在北约增派更多军事力量，新冷战将会拉开序幕，但现在来看，车臣参战、西方国家资助武器资源的情况下，俄罗斯更可能像阿富汗战争一样陷入战争的泥潭，西方国家的联手制裁下，俄罗斯通过出口资源获得的利益将会缩水，这会让俄方难以维持战争的开销，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已经补给不足，炮弹、火箭弹也已经殆尽，如此拖长的补给线会导致乌克兰战场陷入拉锯战，这场战争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俄方经济被拖垮，因而亮出核底牌，两国走上谈判桌，而这样

不是‘和解’，对俄方来说却是全盘皆输，军事力量和西方难以抗衡、动用了核底牌才停战谈判，俄罗斯将会因此沦为二流国家，这会导致西方国家战略方向的转变，如果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降低，由衡量国力的权重将会由军事逐渐变为经济，而美国如果缩减军事开销，其经济有可能呈现回春态势，这对中俄都很不利，美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一系列结果，世界格局将被重新洗牌。而如果俄方赢得战争，其和西方国家互相制衡时将会有更足的底气，战争造成的损失也会在战后被追回，只有这样，战后形式才会对中俄两国有利。

俄乌战争将会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如果遇变，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唇亡齿寒的故事会不会再现，取决于中俄关系能否经得住考验，新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们必须在其中摆正位置，是选择置身事外，还是和俄方站在一起？这个选择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修路”工程见中国基层民主体制问题 2022.3.11

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自称为民主国家，这是一种对民主概念的滥用，在中国、朝鲜这样的国家，民主的概念则被重新定义为国家保障‘大众利益’，而政府机关封闭运行，只有形式上的代议机构，就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民主，暂且不提其公平性与效率，如果公共决策不由人民作出，政府何以保障大众的利益？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代表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但如果把权力完全交到一个人手里，则会产生如下的后果：我一位亲戚居住的某市打算转型为旅游城市，遂把已经建成了几十年的道路挖开，结果这一工程断续干了一年之久，仍未把道路重新修好，而如果不是政府官员做出的决策，这个导致交通堵塞，妨碍百姓日常活动的工程是绝对干不起来的，这就是形式上的民主，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不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于政府来说，如果无法提高官员的水平，就把决策权交给百姓，这是可行的做法。

说民主政治是形式还是过程，要弄明白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是一个人能合理地善用公权力，还是公权行使的受益者手中掌权，放眼我国多的是草民、愚民、贱民，少的是有能力参与行使公权的公民，而现在政府中的草官、愚官、贱官不比前者要少，可见民主决策的重要性，而这又要引入归责的问题：如果一个党的干部或领导人在做决策时犯了错误产生了严重后果，他就会‘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文提

到的‘修路’工程，拍案的市长其人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施工单位，他甚至不用为此负责，但如果这个决策是由市人大决策做出的，那每一位人大代表以至投选这些人大代表的选民都成为了责任人，对人大代表要问一句：你有没有能力代表人民投出这一票？对于选民要问一句，你有没有能力辨别一位人大代表的参选人是否有能力、有资格代表你和其他的选民，以至于所有的百姓？而之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建立不了这种民主制度，一是因为公权过于集中，二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民与人民代表回答不了上面的两个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经验不够所致，而缺乏政治经验，则是因为建国以始，中国就从未有我能让中国人民与人民代表增长政治经验的政治机制，这是一个‘闭环式’谬误，而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或多或少的学到了一些决策的经验，但根基不稳的大厦，盖得越高越容易垮。

这种‘修路’的谬误也暴露了中国的一种国民性：对政治持有的冷淡态度，这修路的工程直接把通向本地客流量最大的一家商场的路给堵死了，而过了这么长时间去投诉信访的也只有这个商场与其周围的一些小店铺，大多百姓则选择忍受更长时间的堵车时间或去绕更远的路，却丝毫不关心这种从出发点到实际落实上根本站不住脚，随便找一位当地人来看，都会觉得荒谬至极的工程是如何被批准实施的，也不问一句，为什么好好的工程会拖这么长的时间？这种工程绝不是个例，放眼全国，与之相似的工程，可观的不计其数；这不禁让我想起‘三年大变样’工程：一个贫困县投资了二十亿，要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重建，在此工程落实期间，一千多户的房屋被非法强拆，这与‘修路’工程又何其相似，这种不顾民主只求绩效的工程，在中国又何谈其少，而正是百姓的置身事外，鲜有上诉，不在政府大门前聚堆抗议，对政府官员的纵容，刚好助长了其乱政的威风，所有受到这种政府错误决策伤害的，或害怕自己受到伤害的百姓心中都应记住这一句话：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你。

民主行政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象征地把人民的利益高举，既然政府无法把有能力的人提拔做官，也不能把低水平的干部再教育上有能力的人，不如放手把权力交给百姓，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选民与人民代表有了足够的政治经验，权利也真正平分到人民手中，中国的基层行政才会更有力、更高效、更正确。

把中国的“权力三角形”倒过来 2022.3.13

中国的权力分布呈一个‘倒三角’形状，这是竖向民主、中央集权产生的结果，处于中国社会最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行使极高的权力，阶层越靠近底层，其构成-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能行使的权力就越小，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其能行使的权力，几乎可以忽视。

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权力分布则与之相反，成一个正三角形的形状，每一位最底层的选民，共同行使其政治权力，把市长、州长、总统推到其位置上，相比底层人民所有的选举权，西方国家总统手中的权力则显得无足轻重，如果选民不继续投西方国家政治人物的票，那么等他过了任期，就没法再连任了，而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权力结构最显著的一个区别：中国的权力分布是倒悬的，更高的阶层来拉动更低的阶层，问题便由此产生出来了，如果处于中国社会最高阶层的领导人不对社会负责，将会断送整个中国的未来，如果领导人的能力不够，整个社会也可能因此崩塌，而西方国家则与之不同，如果总统对社会不负责任，西方社会的结构，不会因为其领导人的问题而崩塌，顶多就是总统被弹劾下台，那也只是空缺了一个能行使权力的最少的社会阶层，而在中国如果发生政治变故，最先遭殃的是人民。

中国正在走向僭主政治，但这个僭主不为自身利益而压迫平民，而是像现在一样为了复兴、解放，让每个人投身于集体社会，而牺牲了个体，中国的执政党要中国人有大局意识，而这种每个人都为集体奉献，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时间与体力，为一个空而大的目标奋斗，以大局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都是人，而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意识就是自由意识，这种集体主义社会是反人性的，也是反自然的，而当有一天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这种狂热的工作状态，每个人，都投身于各种脏活、累活、苦活，都像机器一样毫无怨言的劳作，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不再是悬着的了，领导人只需坐享其成，而对劳动者的惨状无动于衷，这时支撑着整个社会结构的是拥有权力最小的底层劳动者，而这种结构在政治变故的作用下，有很大可能会崩溃，如果底层劳动者承受的压力过大而享有的人权过小，当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中国社会的结构，将会崩塌，而这会产生权力的大洗牌，也会导致社会混乱，所以与其坐等恶果，不如就现在改变。

要想改变崩溃的趋势，中国需要减少处于社会底层人口，提升社会福利，还要减小政府对人民的管控，这样就可以维持社会结构始终稳定，但我们就要止步于此吗？，要想让社会真正健康的运行，我们要把权力的三角形倒过来，归权于民，让人民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利，或者让可以行使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来做社会的地基，在人民的监督下行使权力，只有把社会的三角形结构倒过来，让人民拥抱民主，才算真正真正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政治价值决定公民社会地位 2022.3.13

所有参与政治的公民都有其‘政治价值’，也就是每位公民作为民主政治的参与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能为某一党派、某一利益集团产生多少利益。对于民主程度更高的社会，手握选票的选民政治价值更高，而在没有民主决策制度或者其民主机关形同虚设的社会中，公民的政治价值也仅聊胜于无，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来说，他在行事的时候需要去了解他的所作所为对管辖的人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此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而这种自我反思与自我纠错的政治行为做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其政策作用的公民的政治价值。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除了衡量自己为政有没有办实事，还要注意自己的私生活，还要自觉廉政，因为他是当地的选民票选出来的，选民对官员来说政治价值极高，能否讨好选民直接决定了官员能否继续连任，这是一种健康的权利运行方式，反之，如果公民对于官员的政治价值低，官员在为政时就大概率不会考虑人民的感受，由此便产生了贪腐懒政乱政的现象。

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可以为零，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价值也可以为零，但非民主国家的人民也并非全无人权，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而法律是政治的底线，一个政权可以在政治上极度藐视人民，但因为有法律的存在，在形式上仍然要尊重人民，至于这种口头保证落实如何，则要看这个政权自身的状况与性质如何，如果细看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基层行政，你会发现非民主国家的官员远没有民主国家的官员有责任感，对于公民政治价值低的政权及官员，并没有理由全心全意的为人民行政，对其的任命可能由执政党或者其所属的政权负责，这就导致了在这样的政权中浮现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官员无异于掷骰子赌大点，指望用赌

博的方式来‘赌’出一个好官，可称‘赌徒政治’，而要想让权力长期的运行，赌徒政治是万万不可取的。

一个商品要物有所值，才会有人去花钱购买，这样看来集体主义国家的官员实际上在做一种‘政治慈善’，而慈善这种行为虽然短期无回报，但常做慈善会让一个人的声誉变得更好、让企业声名远扬，以致产生长远的影响，产生的潜在回报可能大于收入，也算一种风险较高的投资；而政治慈善也是如此，官员在任上勤政廉政，其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升迁，而要让自己升官，只要讨好自己的领导就行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既然社会没有民主的反馈机制，官员为什么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如果官员只在乎上级的感受，那他推行的政策、批建的工程可能多是‘大动作’、‘大工程’，这种问题就在于，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最低的阶层对于较高阶层的政治价值为零，而更高阶层则对下层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在西方国家，市长州长如果抽不出时间甚至可以不接见总统，因为这些官员只对自己的下级负责，只对民众和选民负责，而对上级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责任；集体主义国家则刚好相反：官员没有对下级负责的理由，而对上级却要毕恭毕敬、鞍前马后，出现这种乱象，就是非民主体制的问题所在。

要想提高社会公民的地位，就必须提高其政治价值，要增加底层民众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政治价值决定了公民的社会地位，在公民政治价值为零的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是体制的牺牲品，民主国家的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一，十个一加起来等于十，非民主社会的公民，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零，加上一个领导阶层的价值也等于十，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社会的政治价值总和都是十，但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非民主社会中的一个零，你会怎么想、怎么做，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暴力与非暴力革命都是要把零变成一的过程，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的目标，都是要把公民的政治价值、社会地位提高，而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往往都是普世的、民主的。

集体社会的支配者 2022.3.19

集体主义所构想的高度统一的集中化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领导者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并用暴力手段将其垄断，并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对其贡献来统一分配，

集体社会的主权并不在人民手中，而在垄断社会资源的人手中；正因这种社会没有民主的土壤，可以决定资源分配而对民众有着生杀与夺的大权的支配者往往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成为支配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而社会如何约束这样的支配者，则是集体社会面临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要想解决支配者权力膨胀，让其以社会普遍的伦理标准行政，只能寄希望于法治和宪政，用直截了当的法条去约束支配者，而如何牵制领导者的权利让其无法左右立法机构的问题，也曾经困扰着民主社会，对于宪政制度来说，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民主国家通常有两个以上类似议会的机构来稀释国家领导者的权利，而集体社会则把无可牵制、无可稀释的权力交给了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也难以约束其权力，也就没有人能够约束集体社会的支配者。封建皇权的社会中有很多法律，这些律令大多是用来约束人民的，却没有一部用来约束君主的宪法，这种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只能称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并在有限的程度上产生自然效力，这种法律是用暴力工具维系的，而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去约束那些试图侵害自由权力的人，君主自然不想让自己的权力被约束，也有着高于法权的公权力，所以集体社会的支配者与君主就只能自己来约束自己，而要想看出这种自我约束能产生多大效力，只需列一个表格，列出历史上开明的君王和残暴无能的君王，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可怕的从来不是支配者的产生，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财富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相互契合，并保证其行政一定的民主性，二者组成的社会并不一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低效，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支配者往往会因为行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而与人民产生矛盾，而无论在什么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都是不断的，阻止统治者意气用事，让其保持理性，尤其在其手握大权的时候，可称难如登天。

如果支配社会的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直接或代议民主机关呢？让我们把这种假想的民主集体社会和资本社会作对比，不难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市场上，资本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有序的，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财路，而在同一行业内相互竞争的人是有限的，而集体社会中的竞争则是无序的，即使集体社会的商品供应是无限的（即马克思理论中建设共产社会的前提-发达的资本社会），社会的支配者也会减少商品的供应，因为如果社会成了对商品求之即得的伊甸园，就没有人再会

去劳作，社会的伦理标准：支配者统治的根基，就会开始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首先解体的就是支配者的霸权，随后整个社会将会分崩离析，人是不能停止劳动的动物。而如果集体社会处于商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的状态，商业的竞争就变成了原始的、无序的竞争，也就是同人类在原始洞穴中争抢一块生肉一样的竞争，这种竞争产生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道理：集体主义社会的民主要比独裁还要可怕，与其让每个贪心的人来当自己的支配者，不如社会中存在一个支配一切的大独裁者。

让我们反观资本社会，我们不仅要问，市场与自由产权哪里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市场与财产的自由是一种政治上尊重人民的体现，民主与市场经济是鸡和蛋的关系，私有产权并不能保证政治民主，而政治的民主必然会产生经济的自由与独立的结果，财富支撑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保护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支配者都是自己，而竞争的环境则决定了市场自主不能与计划自主一概而论，区别就在于：市场的自主是有规律的、利益驱使的，而计划的自主是没有规律的、人性驱使的。

经济与政治的自由精神 2022.3.27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要通过总结历史来得出规律，以之来指导实践，纵观社会的发展趋势，总能看出从奴役到自由，从封闭到开放，从反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趋势，而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如果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共产主义体制，其实就是建立了一套现代的奴役制度。

思想家弗格森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财产权的观念，自由是人的本性，而是否有财产权观念则界定了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而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些自由人手中掌握了巨量的财富，成为了财阀，政治是必然被这种财阀所控制的，而集体社会中只有一个专权独断的财阀，作为劳动者，不应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到财阀的身上，工人手握着财阀的命运，不论在财富多还是财富少、人多还是人少、共产还是民主社会中，劳动者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如果工人们因不满于现状而罢工，可以给财阀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要挟财阀满足自己的所求。

社会的进化从来不是对某一阶层的抹除，而是试图建立一种让手握权力、财富不

同的阶层之间同心同向、相互协作，从而让社会持续稳定的结构，同理的，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力，不应该试图去抹除阶层的存在，财阀们与劳动者有着相同的高尚或低劣的品性，只不过手握更大的财富对其品性的要求更高，而劳动者在建立道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的左右便在此体现出来：用其有限但有效的反制手段来维护其权利，逼迫无德的财阀成为‘道德资本’。

阶级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是相互契合而协作的关系，而阶级概念则天生就存在着矛盾，从其定义看来，不同阶级之间是互相依存且矛盾不断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阶级其实是一种枷锁，一种煽动民众从而使之团结到一起的象征，对于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更好的工人，与其他受压迫的工人站在一起而去给别人争取利益的行为具有一种宗教的狂热性，把不同的工人组成的阶层简化为对立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有人处于某种目的而有意为之，不同工厂中的工人是有区别的，有的工厂待遇更好，厂主和工人关系良好，工人索取自己的一部分，厂主保有自己有限的利益，其工人就归属于工人阶层而非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反之则同属无产阶级和工人阶层，那待遇更好的工人就不是无产者了吗？

真正的自由精神，是不把任何普遍的矛盾都用社会革命来解决，以无产者为主体的关乎社会中所有人利益的革命，对其指导思想的要求更高，如果革命以建立共产社会为目标，就无异于自己亲手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将法律和伦理的空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才是可行的手段。

西方一众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清了国家制度的风险所在，他们在数不清的著作中向世人传达着约束国家权力来扩大人民权利的自由精神，但这种努力始终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中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并不强烈，自由精神也就无处发挥作用，而之所以马克思主义问世后，就有许多国家去试图建立共产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环境使然，马克思主义直切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迎合了无产者的心理，这些无产者盲目地推翻给了他们工作和生存机会的有产者们，这种行为看似在追求自由与平等，其实是一种实质上的自我奴役行为，当无产者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权，同时就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权利：人权，政治权和斗争的权利，彻底成为了社会的支配者手下劳作不停的工作机器，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之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共产主义的矛盾 2022.3.29

一个社会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竞争却是持续而不公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众对资源的索求与资源的不均衡的现象会极大地激发社会潜力，同时压低社会的进行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成本，而这种个体激烈的生态不应上升到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只应当局限于个体能力决定个体价值、个体之间相互争夺资源的范围内，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应当是可控而持续，而被控制到健康的范围内的，因为垄断与过度竞争会产生成本。

集体主义社会中，负责分配资源的支配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其权利应该被法律与监察机关在控制到一定范围内，但支配者的权力往往要高于二者，我们不难由此看出：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很有可能产生独裁统治，而要让集体社会维持稳定运行，应当机械地、规则地进行分配与支配工作，而如果让人来进行决策，则有很大可能产生偏向和误差，道理如此，手握大权的支配者又怎能放弃自己的权力？资本社会的竞争会产生成本，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这种自主支配财产、自由进行交易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社会的民主性质，而集体主义社会中也有个体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对于社会的推动是极其有限的，集体社会强调同体协作，而并不给予个体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而公有分配制也决定了个体通过竞争能获取到的利益是有限的，社会财富因此几乎平均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化为两个阶层：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这与被认为是资本社会极化结局的奴役社会又何其相似；而在支配者掌握的资源过多、权力过大的情况下，没有人再能够威胁到支配者的地位，由此不难看出：集体社会天生就带着独裁的色彩。

马克思的理论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二元对立的阶级矛盾，却忽视了人与人、人与其本性之间的矛盾，共产理论试图用消除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平等的社会，而忽视了同一阶级中存在的富人与富人之间、穷人与穷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如果社会没有阶级的相互对立，而要让这一状态继续维持下去，个体之间就要长期处于一种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状态，这就导致集体主义难以施行于现实社会，因为要想让社会不产生竞争，就必须提高个体的觉悟与品性，也就是摒除人性中的私欲，而如果能使整个社会的觉悟和品性提高，讨论到底是集体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具有普适性就显得毫无意义了，集体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如果贴合实际、还是整个社

会的集体价值，则对于所有的体制都会产生好的影响，而如果要对比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可行性与适用性的差异，就要先找到让本来不健康运行的两种社会对于个体价值观改变而开始转为良好运行的一个限度，也就是看哪种体制对于民众的要求更高，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体制激发着人性中善与恶的两面，而集体主义则在遏制人性，集体社会、共产社会要求构成其的个体以统一的伦理标准行事，而做到如此程度的统一，只能用思想教化与集权统治来实现，前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实现，而如果危机或矛盾解除，这种集体思潮会慢慢的消退，由信念支撑起来的社会是脆弱而疲软的，这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往往要施以极权统治，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有哪个极权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屹立不倒，极权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怪圈，正是这个怪圈让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了一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幻想。

所有参与政治的公民都有其‘政治价值’，也就是每位公民作为民主政治的参与者，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能为某一党派、某一利益集团产生多少利益。对于民主程度更高的社会，手握选票的选民政治价值更高，而在没有民主决策制度或者其民主机关形同虚设的社会中，公民的政治价值也仅聊胜于无，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来说，他在行事的时候需要去了解他的所作所为对管辖的人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以此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而这种自我反思与自我纠错的政治行为做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其政策作用的公民的政治价值。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除了衡量自己为政有没有办实事，还要注意自己的私生活，还要自觉廉政，因为他是当地的选民票选出来的，选民对官员来说政治价值极高，能否讨好选民直接决定了官员能否继续连任，这是一种健康的权利运行方式，反之，如果公民对于官员的政治价值低，官员在为政时就大概率不会考虑人民的感受，由此便产生了贪腐懒政乱政的现象。

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可以为零，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价值也可以为零，但非民主国家的人民也并非全无人权，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而法律是政治的底线，一个政权可以在政治上极度藐视人民，但因为法律的存在，在形式上仍然要尊重人民，至于这种口头保证落实如何，则要看这个政权自身的状况与性质如何，如果细看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基层行政，你会发现非民主国家的官员远没有民主国家的官员有责任感，对于公民政治价值低的政权及官员，并没有理由全心

全意的为人民行政，对其的任命可能由执政党或者其所属的政权负责，这就导致了在这样的政权中浮现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官员无异于掷骰子赌大点，指望用赌博的方式来‘赌’出一个好官，可称‘赌徒政治’，而要想让权力长期的运行，赌徒政治是万万不可取的。

一个商品要物有所值，才会有人去花钱购买，这样看来集体主义国家的官员实际上在做一种‘政治慈善’，而慈善这种行为虽然短期无回报，但常做慈善会让一个人的声誉变得更好、让企业声名远扬，以致产生长远的影响，产生的潜在回报可能大于收入，也算一种风险较高的投资；而政治慈善也是如此，官员在任上勤政廉政，其最大的动机就是为了让自已升迁，而要让自己升官，只要讨好自已的领导就行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既然社会没有民主的反馈机制，官员为什么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如果官员只在乎上级的感受，那他推行的政策、批建的工程可能多是‘大动作’、‘大工程’，这种问题就在于，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家，最低的阶层对于较高阶层的政治价值为零，而更高阶层则对下层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在西方国家，市长州长如果抽不出时间甚至可以不接见总统，因为这些官员只对自己的下级负责，只对民众和选民负责，而对上级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责任；集体主义国家则刚好相反：官员没有对下级负责的理由，而对上级却要毕恭毕敬、鞍前马后，出现这种乱象，就是非民主体制的问题所在。

要想提高社会公民的地位，就必须提高其政治价值，要增加底层民众对高层政治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政治价值决定了公民的社会地位，在公民政治价值为零的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是体制的牺牲品，民主国家的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一，十个一加起来等于十，非民主社会的公民，每个人的政治价值都是零，加上一个领导阶层的价值也等于十，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社会的政治价值总和都是十，但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是非民主社会中的一个零，你会怎么想、怎么做，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暴力与非暴力革命都是要把零变成一的过程，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的目标，都是要把公民的政治价值、社会地位提高，而革命之后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往往都是普世的、民主的。

集体主义所构想的高度统一的集中化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领导者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并用暴力手段将其垄断，并根据每个社会成员对其贡献来统一分配，

集体社会的主权并不在人民手中，而在垄断社会资源的人手中；正因这种社会没有民主的土壤，可以决定资源分配而对民众有着生杀与夺的大权的支配者往往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成为支配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而社会如何约束这样的支配者，则是集体社会面临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要想解决支配者权力膨胀，让其以社会普遍的伦理标准行政，只能寄希望于法治和宪政，用直截了当的法条去约束支配者，而如何牵制领导者的权利让其无法左右立法机构的问题，也曾经困扰着民主社会，对于宪政制度来说，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民主国家通常有两个以上类似议会的机构来稀释国家领导者的权利，而集体社会则把无可牵制、无可稀释的权力交给了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也难以约束其权力，也就没有人能够约束集体社会的支配者。封建皇权的社会中有很多法律，这些律令大多是用来约束人民的，却没有一部用来约束君主的宪法，这种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只能称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并在有限的程度上产生自然效力，这种法律是用暴力工具维系的，而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去约束那些试图侵害自由权力的人，君主自然不想让自己的权力被约束，也有着高于法权的公权力，所以集体社会的支配者与君主就只能自己来约束自己，而要想看出这种自我约束能产生多大效力，只需列一个表格，列出历史上开明的君王和残暴无能的君王，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可怕的从来不是支配者的产生，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财富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相互契合，并保证其行政一定的民主性，二者组成的社会并不一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低效，但事实却告诉我们，支配者往往会因为行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而与人民产生矛盾，而无论在什么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都是不断的，阻止统治者意气用事，让其保持理性，尤其在其手握大权的时候，可称难如登天。

如果支配社会的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直接或代议民主机关呢？让我们把这种假想的民主集体社会和资本社会作对比，不难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市场上，资本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有序的，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财路，而在同一行业内相互竞争的人是有限的，而集体社会中的竞争则是无序的，即使集体社会的商品供应是无限的（即马克思理论中建设共产社会的前提-发达的资本社会），社会的支配者也会减少商品的供应，因为如果社会成了对商品求之即得的伊甸园，就没有人再会

去劳作，社会的伦理标准：支配者统治的根基，就会开始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首先解体的就是支配者的霸权，随后整个社会将会分崩离析，人是不能停止劳动的动物。而如果集体社会处于商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的状态，商业的竞争就变成了原始的、无序的竞争，也就是同人类在原始洞穴中争抢一块生肉一样的竞争，这种竞争产生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道理：集体主义社会的民主要比独裁还要可怕，与其让每个贪心的人来当自己的支配者，不如社会中存在一个支配一切的大独裁者。

让我们反观资本社会，我们不仅要问，市场与自由产权哪里有这么大的魔力，可以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运行？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市场与财产的自由是一种政治上尊重人民的体现，民主与市场经济是鸡和蛋的关系，私有产权并不能保证政治民主，而政治的民主必然会产生经济的自由与独立的结果，财富支撑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保护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支配者都是自己，而竞争的环境则决定了市场自主不能与计划自主一概而论，区别就在于：市场的自主是有规律的、利益驱使的，而计划的自主是没有规律的、人性驱使的。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告诉我们：要通过总结历史来得出规律，以之来指导实践，纵观社会的发展趋势，总能看出从奴役到自由，从封闭到开放，从反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趋势，而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如果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共产主义体制，其实就是建立了一套现代的奴役制度。

思想家弗格森认为：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财产权的观念，自由是人的本性，而是否有财产权观念则界定了一个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而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些自由人手中掌握了巨量的财富，成为了财阀，政治是必然被这种财阀所控制的，而集体社会中只有一个专权独断的财阀，作为劳动者，不应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到财阀的身上，工人手握着财阀的命运，不论在财富多还是财富少、人多还是人少、共产还是民主社会中，劳动者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如果工人们因不满于现状而罢工，可以给财阀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要挟财阀满足自己的所求。

社会的进化从来不是对某一阶层的抹除，而是试图建立一种让手握权力、财富不

同的阶层之间同心同向、相互协作，从而让社会持续稳定的结构，同理的，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力，不应该试图去抹除阶层的存在，财阀们与劳动者有着相同的高尚或低劣的品性，只不过手握更大的财富对其品性的要求更高，而劳动者在建立道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的左右便在此体现出来：用其有限但有效的反制手段来维护其权利，逼迫无德的财阀成为‘道德资本’。

阶级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阶层之间是相互契合而协作的关系，而阶级概念则天生就存在着矛盾，从其定义看来，不同阶级之间是互相依存且矛盾不断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阶级其实是一种枷锁，一种煽动民众从而使之团结到一起的象征，对于生活状态和工作环境更好的工人，与其他受压迫的工人站在一起而去给别人争取利益的行为具有一种宗教的狂热性，把不同的工人组成的阶层简化为对立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有人处于某种目的而有意为之，不同工厂中的工人是有区别的，有的工厂待遇更好，厂主和工人关系良好，工人索取自己的一部分，厂主保有自己有限的利益，其工人就归属于工人阶层而非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反之则同属无产阶级和工人阶层，那待遇更好的工人就不是无产者了吗？

真正的自由精神，是不把任何普遍的矛盾都用社会革命来解决，以无产者为主体的关乎社会中所有人利益的革命，对其指导思想的要求更高，如果革命以建立共产社会为目标，就无异于自己亲手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将法律和伦理的空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才是可行的手段。

西方一众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清了国家制度的风险所在，他们在数不清的著作中向世人传达着约束国家权力来扩大人民权利的自由精神，但这种努力始终也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中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并不强烈，自由精神也就无处发挥作用，而之所以马克思主义问世后，就有许多国家去试图建立共产社会，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环境使然，马克思主义直切当时最大的社会矛盾，迎合了无产者的心理，这些无产者盲目地推翻给了他们工作和生存机会的有产者们，这种行为看似在追求自由与平等，其实是一种实质上的自我奴役行为，当无产者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权，同时就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权利：人权，政治权和斗争的权利，彻底成为了社会的支配者手下劳作不停的工作

机器，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之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五四小史 2022.4.12

1919年五月二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聚于北大西斋饭厅，群情激昂，他们在讨论当年初的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美国在会议中提出了广受各国欢迎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联等一系列和平主张，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但当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说帖》交由大会，经多方陈述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角力，大会最终决定支持日本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三天后，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大背景

后人评价五四运动时，总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那么它重要在哪里？五四是一场学生与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这场革命基本达成了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思想与政治热情，也让新文化运动加以推广，同时滋

生出类似共产党的一些爱国团体，但其中不同势力对于新文化的态度不同，国民党的孙中山提倡传统文化，而否定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运动，孙中山则予以肯定态度，蒋介石的态度很微妙，尽量与之保持距离，但明面上还是予以肯定，共产党则态度统一，陈、毛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都相当积极，中共认为：五四运动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文化革命推进到新阶段，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也从此开始参政，此后成为革命的重要领导。

看向国际，一战激化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全球范围革命的火花在战后不久因此被擦亮，先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又有朝鲜的三一运动，这些民主革命，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五四革命因此而起。西方的思想与世界上各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持续影响着近代中国，这些与保守旧势力水火不容的思想在晚清时传入中国，首先改变了中国青年，借青年之手推翻了清政府和其他各种站到大众利益对立面的反动势力，受这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涌现了一批类似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这样的文化组织，它们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基础，对五四运动能否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外来思想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凸显出其先进性与优越性，中共已之为基础成立，许多进步青年因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些后来成为了党的领袖。

五四运动时，中国有两个政府与众多派系，以大总统徐世昌、段祺瑞为领袖的北京政府中，各权利达到平衡，使其运作较为通顺，政府中以段奇瑞为代表的亲日系，梁启超的亲美系借机煽动社会情绪，互相角力，这些派系为利益而始的争斗，是五四运动的幕后推手之一。

南方政府则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及北伐中被分裂，冯国璋、阎锡山、陆荣廷等军阀参与权利斗争，这些军政府各拥军队，各自为政，关系交际复杂密切，这种邦联性质的政府让南方政治变得环境复杂混乱，这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通过在中国不断扩展实力来侵占中国领土，占有台湾、朝鲜等地，侵犯了我国主权。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北洋政府接纳了其中大部分要求，因保密不力被新闻界得知，从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也在之后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战的发生使欧洲无力把控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也借此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轻工业与商业得以快速壮大，工商阶层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声援爱国青年学生的主要力量。

开端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中国的国家主权遭到践踏，山东权益被交由日本，《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所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二月至三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九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林长民发文呼吁民众‘誓死图之’。

次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大会，千余人出席，其他各界和高校也有代表应邀参加，并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予以私下支持，大会号召救国，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订出四条决议：一、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火烧赵家楼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各校代表召开碰头会，教育部派人前去劝阻未果，随后，北京大学等数所院校千余名学生汇集于天安门前广场，开始进行示威抗议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前去镇压的军警见势撤离，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被散发给学生和群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队伍随后向东交民巷进发，但巡捕房不准学生通过，学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馆递送说帖，其中一篇说帖中这样说：“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

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国继承之，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但终未见到各国大使。

东交民巷未能通行激起了示威群众的情绪，学生们临时决定前往位于赵家楼二号曹宅，并于下午四点半到达。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前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门前有数十名军警把守，试图镇压学生的示威，学生们后翻墙打开大门，却未找到已经藏起来的曹汝霖，只抓住了章宗祥，并殴打了他，随后学生们捣毁家具、放火烧楼，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前来镇压，并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返校日

北京政府对于此次运动态度强硬，徐世昌总统下令让军警加强管控，并在五月七日驱散了国耻纪念日活动，次日训诫教育部并让其整顿学校，五月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五月十八日，日本公使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并派遣军队到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巡逻，并施加武力威胁。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下令让所有学生在三天内复课。

各校校方在短暂调停之后选择与政府对立。五四之后，北京各校集合开会，重申要求，并邀请到十四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学生们要保持冷静。五月六日，北京各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九日，蔡元培辞职，十一日，教育总长傅增湘辞职，多所学校校长纷纷辞职，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因此成立，与此同时，被捕的学生们向法庭提交声明。

罢课开始时，各校自行其是，到五月十八日，学生联合会决定北京高校全体罢课并上书总统、发表公开宣言，提出六点要求：不可签字山东条约、惩办曹章陆、挽回蔡傅、撤销对学生压力、抗议日本留学生被捕、重启南北和谈。

五月二十一日，钱能训总理表示学生的要求会郑重进行，随后采取高压手段，这迫使学生进一步加强组织，并开办类似义勇团、自治团的集会，学生运动从大规模集会逐渐转为街头集会。

五四运动致此影响了二十多个省的两百多个城市，各地院校的学生纷纷响应，并成立起了地方学生联合会，六月十六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

会。

新闻媒体、社会和工商团体在五四运动中纷纷表示支持学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学生，孙中山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一些军阀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学生。

六三运动

六月三日的北京大逮捕引发了上海的罢工浪潮，进而扩展为全国运动，五四进入一个更激烈、更广泛的阶段，已经不完全是由青年学生领导的社会运动，得名六三运动。

六月一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戒严背景，并在之后开始逮捕学生，学生开始出动更多的人上街，到六月四日，逮捕了上千名学生，政府不得不征用学校来作为临时拘留所，学生因此出动更多的人在街头演讲，千余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给被关押的学生送去食物。

五月下旬，上海学生与商人、工人积极联络，扩大了运动的规模，使工人运动成为运动的新的中心，五月三十一日，上海为在五月七日去世的北大学生郭钦光举办追悼会，十万余名学生及群众参加，北京大逮捕开始之后，上海学生与工商界领袖开会，走访商店，恳请支持。六月五日，大罢工开始，各地商店纷纷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参加人数超过五万人。当天，上海各界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罢工浪潮因此扩散到全国。

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政府终于选择妥协。六月五日，军警从校园撤退，六月九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辞职，随后，钱能训总理辞职，各地的罢工随即停止。

六月二十日，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要签约的指示，让他们自行决定签约。全国各界给代表团发了七千余多封电报，要求其不可签约，巴黎华侨也组织游行示威，并要求绝对不可签约，代表团跟和会沟通，看是否能签约但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和会在讨论后决定不予采纳，代表团一直抗争无果，最后，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后来中国政府与德国单独谈判，签署了《中德协约》，德国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在几个战胜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在美国的调停下，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胶

济铁路交还中国，撤出所驻日军。二月六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山东问题最终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圆满解决。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样评价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太危险了！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有陷于无形消灭的危险！”

日本帝国主义者初则利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继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缔结所谓“中日军事协议”，向中国的领土进兵。日军复擅自攻取青岛，并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路矿权利。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侮辱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迎来了高潮，半年内涌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新刊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文化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思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随之开始发展，1920年三月，邓中夏、刘仁静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的时候最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渐渐被政治环境排挤，但五四运动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认为五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四月，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成立了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后马林来到中国，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在五四之后，出现了反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苏联带领中共策划并发动了这两项运动，许多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一体现，但此后进入一个不同思想宽容发展的时期，孙中山等一众知识分子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组织发展很快，中文版圣经在1919年翻译出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随之于1922年四月四日在北京举行。

五四之后中共发起了有组织的反基督教运动，得到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热烈回应。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拟定了反对基督教的计划，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共青团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三月四日成立反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

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在几天后在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期发表特刊，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并号召全国学生，起来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

五四之后，大城市中的商户开始团结组织起来，并在上海建立马路商界联合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

社会革命论的谬误 2022.5.2

历史的走向是不能用从一种主义到另一种主义来描述的，政治上的某个主义是由某个学者提出的，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某某学家的理论只是河水中冒出来的一些泡泡，可能这个理论的泡泡足够大，大到影响了作为整体的河流，它破灭之后社会的发展还是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而当我们放宽视野，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国家的社会发展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规律：由天制到君制再到人治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埋头苦干的时代和觉醒自我的时代，社会主义无疑是人治时代的开端之矢，作为撼动西方自由社会，误导了东方的两个穷国，让许多小国被世界孤立的开山理论，社会主义固然有着许多的谬误，在其中作为建立平权社会捷径的革命论，则是诱使理论中的谬误在和平时期爆发的元凶。

暴民政治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提倡的，甚至有人就此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只要发动社会最重要的一阶层，使其成为暴民，他们就能带动着愚民一起去推翻踩在他们头顶上的支配者。而不论是在现在的中国，还是在过去的西方国家，社会活动家们都弄错了一件事情，或者说这是理论家故意将其隐藏的一点：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工人所受到较低待遇与富人受到更好待遇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底层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矛盾，换句话说来讲，就是受政府统治的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者都明白这一点：资本主义能极大的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正是政府希望看到的，而几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律中都有一条：个人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无产者的革命并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其推翻的政府无论是不是真的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者都认为只要推翻了自己头上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府，自己的日子就能过好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违逆法律和公权力、无理而野蛮、出于自身利益的暴

动，而不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

如果一个政权是这样的暴民建立的革命，那么暴民政治作为政治文化，将会伴随这个政权的历史一同延续下去，即使在和平时时期统治者也要革自己人的命、造自己人的反来肃清政权内部的敌人，维持政权的稳定，这种暴民政治显然是行不通的，而社会的底层人要想给自己争取权利，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无产者普遍低估了自己的合法行为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大小，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如果现在中国政府公布了烟民抽烟给政府上的税，占我国军费开支的百分比，全国的烟民们一定都坐不住了，我们要是不抽烟，你军队都没得养！烟民可以以此要挟国家，把烟的价格降下来一点，或者多开发几种口味的烟。这个道理作用在其他形态的社会亦是如此，如果行业内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罢工，三天一小罢，五天一大罢，那就没有什么是协商解决不了，而这种罢工行为无疑是触犯了统治者和企业主的利益，如果罢工行为不合法、不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罢工尚不如革命。法律的作用便在此体现出来了，要让社会在发展的同时普遍保证无产者的利益法，权利必须高于公权力，这是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这种‘长治久安’很奇怪，明明工人天天出去罢工作乱，社会还能长期稳定运行，而事实就是如此。法治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治，也是人治，只要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内行事，权利就受到保护，人在法内是自由的。而对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矛盾的问题，有的国家并非选择了让工人与企业相互牵制的法制，而是试图约束企业的行为，而企业会再去约束劳动者的行为，最终承受的压力最大的非但是政权想要压制的企业，而是企业压制下的劳动者，况且这种对企业的压制是不利于发展的，又有哪个政府愿为其实呢？

不论是在法律不完善的当年，还是法律健全的现在，合法的维权都是上策，革命都是下策，只有在面对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社会时，革命才利大于弊，而病入膏肓的社会是从来没有存在于现实中的，而只存在于社会活动家们的大脑之中，换句话说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有着科学性、缺乏实用性，但对无产者能产生的煽动作用则是在任何一个有着财富-劳动力交换的社会中都能发挥作用的，我们暂且不看由这一理论指导能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但就革命的论调而言，马克思主义真正想要驱使人们去做什么就不言自明了。

现代社会剥削系统的原理 2022.5.14

随着社会的逐渐演化，劳动者的认知水平普遍提高了，大多数用劳动力来换取生存机会的人已经明白剥削的意义，开始用自己的手段来维护权利，而工人的手段是有限的，剥削的现象却普遍存在而难以根治的。总有人试图用体制变革的方式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西方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社会中存在的最普遍的剥削形式，是企业主对劳动者的直接剥削，这是在社会共识与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条件下，野蛮的企业对劳动者的态度的直接体现，由于这样的现象的普遍存在，共产主义理论诞生了，许多国家以至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蓝本，并迫不及待的付出实践，孰不知在共产社会中原有的问题被放大了，矛盾更加直接化了，哈耶克认为，金钱与自由产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一发明就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于共产社会的状况，从人人都有谋生的权利，到个人为集体而劳动，集体保障个人的生存，人性与人权在共产化的进程中被逐渐剥夺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人不保有自己谋生的权利，人就成为了被圈养喂食的动物，而哪一天喂食、哪一天不喂食，取决于饲养员的心情与动物园的收入状况，与之相似的，如果在自由市场模式的社会中企业被国有化，那么被扩大的不是劳动者的权利，而是政府的权利，国有化的公司会不会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机关协助下的剥削机器，全看政权自身的意愿是否如此，但即使我们不用最大的恶意来揣度公权力的行使者，都不难发现国有化经济实际上是在将社会形态导向为极权主义，因为最终政权经由企业之手行使的是绝对的权利，而绝对的权利就导致绝对的腐败。

现代的剥削系统，其实是在建立在政权提供的基础之上，一些国家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政府一方面在形式上试图控制企业的扩张垄断，实际上把握着企业的命脉，另一方面又默许企业的扩张和垄断，同时通过行政与司法机器来帮助企业进行剥削，可见的，这些企业已经被‘国有化’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企业实际上是政权手下的敛财人，这些供养着政权的企业，通过利益互换获得了对劳动者来说相对稳固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中，政府对于企业的庇护手段，经常存在以下特征：法律上并不支持罢工、现实中用舆论造势来否定工人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牺牲劳动者的利

益，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剥削。

体制上的剥削与政治上的剥削都是一种形式，而要想让剥削的系统运行起来，劳动者先要有一种动机，接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去尝试反抗，从这种动机来剥削劳动者，这就是我们现在可见的不公平的现象，激烈的竞争、种种对于财富的幻想，其实是政权伙同企业，给劳动者营造的为了榨取其劳动力的一种虚假的环境，当人脱离了这种环境，了解到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时，才会明白自己已经身处剥削之中，这种思想剥削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社会中无论企业压迫劳动者，让生产扩大化，还是企业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从而拉动消费，对于政权来说都有益无害，而发展还是保证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的答案，是政权先要弄明白的，如果政权不明白该怎么做，劳动者们就该明白，其最大的敌人是公权力和法权力，这就是现代社会剥削系统的根基。

经济形态何以塑造社会政治形态 2022.5.19

有这样一种规律：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计划经济与专制统治就像两对小哥俩一样，总是在不同的国家一齐出现，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着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的政体都处于民主化和民主化完成的状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往往都存在着一个专制的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先要问一句：政府的权利是谁提供的？谁在维护政府的权利？

不论是专制政权还是民主政权，作为行使公权力、管理社会的一个集团，都与其治下的社会签订了一个契约，而这个契约是“劳动合同”还是“卖身契”则界定了社会的形态，如果政府与人民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人民就有权力通过劳动来给自己谋取利益，并有支配其个人财产的权力，同时用纳税的方法来供养政权，政权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军队和官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把收上来的税通过公共服务来回馈于纳税人，社会在客观上就握持的政权的命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与政权的政治站位往往是对等的，而如果政府与人民签订的是“卖身契”，人民就只有进行义务劳动才能换来一口饭吃，土地、住房和其他财产均由集体来分配，政权就会支配义务军队、义务官僚和义务劳动者去做非他们个人意愿或社会整体意愿，

甚至违反伦理道德的事，这种形态的社会中，政权与人民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政权并不用法权来驱使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保障利益，而是自己成为契约权利的行使者。

契约塑造了政权的形态，那谁塑造了契约的形态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制度塑造了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纽带，间接地塑造了政权的形态，经济形态在这里并不是狭义的市场或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民族性与国民性，是这种民族性与国民性自然形成的经济制度，塑造了政权，而不是政权选择去在社会中施行某一经济制度。回到刚才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有私有产权就会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的产权和市场经济保障着社会 and 政权有着平等的政治地位，政权的设计者便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去保障人民的利益，自由市场经济不但会客观地促进社会的发展，还会作为国家内在的动力与反制力来约束政权的行政，相对的，当社会的命运受政权支配时，国家内部就没有这种动力与反制力，也就不存在什么民主或不民主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规律：在还没有城邦与国家，原始人们就开始把以物易物、以贝易物的交易当做一种生活，把市场的竞争视作对经济的促进，已经有了私有产权的概念的地区诞生的多是民主的政权，而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发展环境没有来自自然的压力的鱼米之乡中，农户们往往坐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小农经济被强权剥夺时，这些农户们会投靠另一种强权，因为暴力政权对小农经济只能进行剥夺，而难以摄于其中而从中获利，和平时期政权也会用强制的手段硬生生地把生存的压力强加于劳动者，这与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无益，也与计划经济一样，只能用暴政来维持运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的普遍经济形态，极大的影响和改变了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基因。

最开始问题的答案已经清晰明了了，要想保证社会的民主制度，并使之长期稳定的运行下去，社会的经济形态一定要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有自有产权才会有民主政治，正是资本主义精神保障着民主政治，而如果人民不保有自己的财产权与对财产的处置权，他们头上将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专制政权。

民主的理解误区 2022.5.19

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通常会产生两个误区，其一，民主并不是全范围的。实行民主体制的目的是为了集思而广益，用群体的智慧来代替个人的智慧，最初的民主体制的缔造者的初衷如此，但却弄巧成拙，在群体智慧并不优于个人智慧的社会早早的开启了民主的时代，而随着社会的不变革，民主体制也在慢慢的逐渐自我革新优化，从低效向高效发展，从广泛而客观公平的完全民主演化为有指向性、目的性的，更加稳定的民主体制，误区其二在于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民主决策制已经是历史了，已经在发展中被社会淘汰掉了，民主的形式从集思广益演变为民选选拔出一位领域内最高水平的强人，而选民在民主过程中有着投选某人、不投选某人与弃权的权利，这让这种结果上的精英政治永远不会演变为独裁统治，这对于选民的政治嗅觉和社会的洞察力要求很高，但当我们把完全民主制、民主代议制和选举制度放到一起，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体制是最容易实现且最稳定的。

由上面提到的两个理解误区看来，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选主是目前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其他的民主形式都是被淘汰掉的，由此不难看出，任何在现代社会中试图建立民主决策制度的尝试，都是在试图造就一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因为政府的公权力往往与民主权利产生冲突，而权力极高的政府往往可以左右民主机关，这是社会契约赋予政府的权利，而这种权力限制下的议会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机关，可见决策而非选举性质的议会只是名义上的议会。同理的，没有选举制度的体制，不能直接决定行政机关构成的民主制度，都是名义上的民主制度，同时有着很大可能沦为政府，让其行使权利的形式合法化，并扩大其权力的工具。

选举的民主制度也有可能被某个党派或某个政府所操控，而要想规避这种风险，有很多可行的手段，已经被实践的手段类似多党竞争、法治宪政的体制，都是在尝试用其他权利来约束政权，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同时也是建立民主制的基石，就是民主的政治基因与开放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民主制胜的关键，比哪个政党的领导，哪种理论的指导更具有现实意义。

政治的竞争与垄断 2022.5.28

一个社会从不会因多元而混乱，这是因为多元产生的混乱只是一种乱象，而乱象稳定之后留下来的往往是平衡而相互契合的多元结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多元的竞争都优于一元的垄断，多元提供机会，机会可以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一滩死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行业内最大的企业与新生的企业之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多元社会是产生不了垄断的结果的，垄断只会作为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而很容易结束的现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的竞争与市场中的竞争一样，如果有多个政党同时竞争执政党的位置，那么每一个政党都会不断的尝试去加强自己的竞争力，与企业竞争相同的是，这种政党间的竞争会普遍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而最终获胜的党派一定是政治水平最高的政党，而民主体制会像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一样，不会让竞争中的赢家通吃，为了掌握更高的政治权力，会有其他的政党设法去提高自己来在民主政治中取胜。这种机制之所以能良好的运行，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让民主政治始终保持活力，让民主政治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让每一位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一票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才能让新旧政党在竞争中轮替，对于政党来说，他们与市场中的企业一样，把利用恶性竞争手段来攫取利益当做一条捷径，而如何保持民主政治的纯洁性，对于政治机制的要求就更高了。可见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也不对政党的行为加以约束，甚至没有民选和多党竞争的制度时，这个社会就已经或正在转向极权社会了。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联结在实际上是存在并起着很大作用的，市场能逐渐地促进政治民主，而民主也会让市场经济健康的运行，相对的，一元的经济会滋长一元的政治，而一元的政治也会借一元经济来扩大自己的权利，这种一元的经济并不指单指计划经济，而是指调控与管理市场的不是市场自发的调节而是政治权力，政府或部分或完全的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插手对市场来讲并非完全无益，但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决定企业的生死，那么市场经济的多元性就被改变了，企业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不同企业共同受制于强权政府，多元的局面被单一的权力控制着，市场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即使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去使对手获利的逻辑，那么市场中的竞争者们就永远不可能联合起来与公权力相抗衡，当没有与之抗衡的对手时，政府就拥有着绝对的权利，而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政治上的垄断不仅体现于市场结构的单一化，还会将恶果作用于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政党之间的对立与竞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竞争，公民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而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如果政治变得一元化了，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就并不一定是最优的、普适性的政治理论，其首先要服务于政府与执政党，其次才会问一句：这种理论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与之同理的文化和其他精神生活的必需品，也将会充斥着单一化政治中政府和执政党需要的论调，这并不会让社会更加的稳定，反倒是给每一位已有积怨的、不满于当前政府的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画了一个靶子，这些人就因为政治的一元化有了仇恨泄愤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公民对政治的看法就只剩下赞同或反对，而非赞同某一可能执政的政党，反对某一不可能下台的政党，这会让社会中的情绪逐渐积聚，从而滋生出暴动与革命，相对的，在并不存在政治垄断的民主社会中，政府作为执政党和领导人意志的执行者并不承受相对应的责任与公民的怒火，而轮替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也把社会对整个领导阶层的不满转嫁到了某个人或某个政党身上，这是极有利于稳定的。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运行的民主政治不会产生独裁和垄断统治，同时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

一个社会不一定要拥抱民主，民主也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而应该在不同权力的博弈中始终保持多元的本色，让竞争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拥抱多元才能迎来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民主的自由批判 2022.5.28

现代社会的民主不一定会催生和助长自由，也不只有民主的体制与自由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不论社会有怎样的民主制度，决定其发展方向的都是社会中的个体，而个体的政治行为往往被两种现象或潮流所左右：社会的普遍意志与共同原则、社会内在的政治基因和政治文化。

民主制度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首先是提供标准，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用他所了解的知识是有能力去衡量一事物是该完成还是不该完成的，而个人可能会犯错，为了避免个人的决策产生错误，那在进行决策时就只有两种途径：统一的

评定标准，与多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了决策，标准是不可能被细化到可以用来决策社会中的所有事物，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尽量保证更多公民的利益，民主诞生了，在民主决策的体系中，我们既不能假定每个人都有着足够进行决策的认知水平，也不能假定有足够认知水平进行决策的人能把自己的智慧部分或完全的发扬出来，因为比较专业的事务，需要进行专业的分析，而民主又让专家的分析成了一家之言，而如果多数人的决策与专家的研究结果相悖，从而经多数之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民主就已经背弃了其初衷了，我们不能假定民主能够产生出好的结果，但是可以预见的，民主的结果是理性的人得出的。因为社会的普遍意志是由社会的共同原则-难以改变的成见与观念，这导致不论在进行关于何事的决策时，得出的结果往往是同一倾向的，如哈耶克所言：多数多数人的决定之所以获得权威，不是因为多数人表达了其意志这一简单的行为过程，而是因为社会对某些共同原则存在着更广泛的认同，而这种社会的共同原则，没有人敢保证它不会出错。

与共同原则一同左右民主政治的，是社会的政治基因与政治文化，这与共同的原则一样，是普遍的社会意志中的一部分，区别在于：共同的原则决定了民主政治的结果，而政治基因则影响参与民主的人的自身的意志与民主政治的参与者的构成，政治基因决定了参与政治的与对政治敏感的永远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认知与参与政治的习惯难以改变的人。与对其他多种事物进行决策时所用到的知识不同的，个体的政治观是独立于价值观而存在的，难以溯源，且难以改变，同时也是根深蒂固的，不同人的价值观作用到公共事物上，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而相去甚远的个体的政治观，对民主政治能产生的影响则是潜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惯性”，正是政治惯性与共同原则，一同催生固化的民主。

自由主义者通常持如下观点：民主首先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好处不在于它是选择谁进行统治的方法，而表现在人口的绝大多数积极参与了意见的形成，因而也相应的有许多选项供人们去挑选，而政治家的任务是发现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而不是使在较远的将来，可能成为多数人的观点的新思想传播开来。而政治家的数量是有限的，可以被普遍认同的民主意见也是有限的，民主政治的参与者是被裹挟于他人的选择与普遍原则之中，还受自我的政治观左右的，这导致民主政治对于参与的双方都是有限的，而在这种局限性上还有着其他

的禁锢。

民主如果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而不用去细究落实于现实社会中可能产生的结果，那么民主政治可能会影响个人的生活，甚至进一步限制个人自由的弊端就体现不出来，而如果问题开始凸显，民主政治就会变为暴民政治，而让“多数人的暴政”使民主权力成为恶性权力的原因，正是民主权力的无序扩张，而要在长久的发展中不让民主权力化为恶性权力，不应当寄希望于民主权力的行使者，而应该把多种权利都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同时让不同的权力相互牵制，让法权力、公权力和民主权利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共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如此，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民主对个人的自由的促进作用才能够体现出来。

劳动阶层的演化及政府管制经济的局限性 2022.6.4

当我们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农奴制到农庄经济、工业革命再到现代社会，随着单位人口生产力的提高，工人（或工人觉得自己）可受到压迫与剥削的空间都在增大。我们可以将这种规律的产生的原因排除于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的问题之外，因为压迫与出卖劳动力的现象是在无论什么地区、什么时代都存在，同样这也不是劳动阶层受雇于的雇主阶层的问题，因为不论在什么时代，劳动阶层与雇主阶层的特质都是大体相近的，驱使着雇主阶层去压迫剥削劳动者的敛财的心理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工人认为他们受到的压迫在增大的现象的产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计算开始，人作为一台劳动的机器，其所能提供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对于训练有素的人与刚刚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能提供的生产力是相差无几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单位人口的总生产力减去既定的单位人口的净生产力，就可以得出机器提供的生产力的附加值，而工人之所以认为自己受到了更多的压迫，是因为工人还没有适应机器为他们带来的便利，也没有理解机器其实是工厂主提供的，而他们应得的只是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而是用自己的总生产力来估算自己应得的工资，把机器提供的附加值代入预期的得到的工资之中。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要按照常理来讲，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工人劳动所得的利益应该是减少的而非增多的，但因为工人的利己之心，同时雇

主阶层也没有适应逐渐改变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结构的社会的的发展,从而招致了工人的仇恨与报复,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工人普遍认为自己被剥削压迫的现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没有同时代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并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当中一直将自己作为劳动活动的主体。同时因为机器提供的便利,劳动者在劳动时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力也会减少,相应的,如果不考虑工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工作使劳动者所受的压力反而变小了,而工人把因为工业化、现代化而在而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增加与工作压力混为一谈,也是导致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

在十九世纪,政治学家们所担忧的、想要限制的其实是刚刚形成,还在进行无序扩张的原始资本主义,而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都需要时间的沉淀,而这也正是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学家不再研究有关剥削的理论,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沉淀,在西方国家这种制度已经趋于稳定,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在数百年间始终未曾崩溃,而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至今也才百年,就已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中接连崩溃,哪种形态更具有普适性就显而易见了。同时可见的,从工业革命至今,平民的健康状况与平均寿命都在增长,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带来死亡与疾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劳动者已经把工作的环境、工具的提供当成了企业理所应当做的事,现代的劳动者使用着汇集了所有高新技术的最高级的工具,在相较于过去更优良的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中,还要求着不断提高自己的工资,而其实现在最勤劳最能干的工人在工作时所付出的劳动力,可能只相当于过去最懒惰与最消极的工人所付出的,时代虽然在发展,可是用劳动力进行物质交换的这一交易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有劳动者自身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对于企业对劳动者的这种“压迫”,很多人将其归罪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放任市场不管的政府,把自己的无能归责与市场经济与雇主阶层,并希望强权政府的出现来遏制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或出现由政府自己主导的管制经济,但这些都忘了一件事:只有一个团体能合法、合理地用各种手段从社会当中攫取财富,也只有一个团体可以在不论企业盈利还是亏损的情况下从中获利,也只有一个团体通过垄断暴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这是政府合法统治的根基。对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既不能假定政府的公权力不会在管制经济的过程中演变为恶性权力,也不能假定政

府能够合理地分配资源而非营私舞弊，有关于前者的问题，我们也只需要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在这里我们假定此时的政府像世界上存在过的大多数政府一样，是把为自己的权力的扩大与维持自己的合法统治，作为首要目标的政府，我们就不难发现单位的劳动人口越聚集、国家可能从获利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工人的劳动能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只有在消费时才能体现出来，只有在消费者消费时国家才有利可图，消费的行为是国家要去拉动的，而国家的主要收入是税收，只要去计算一下，到底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给政府缴纳的税多还是个人在消费过程中给政府交的税多，政府更加支持和倾向哪边就不言自明了。事实上在一些国家，政府首先看重的是经济的扩大与发展，而非经济效益，在这种国家中，政府就会联合企业来压迫社会中的所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而抱怨这一事实的人，只是恰好不幸的生活在了这这个国家罢了。即使抛开这些不谈，在实际上如果政府想要着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压迫问题，就必须要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这无异于劫富济贫，而如果政府开始劫富济贫，它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就已经失去了，而如果政府只是在法律上或尝试以其他正当手段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不受政府的约束，而资产阶级的一切看似不合理的经营行为，都是用合法的手段推动的。

先暂且不提资本主义社会中压迫的现象是不是实际上真如工人与煽动者们所言的，我们可以预见的，在政府完全管制经济或在某种程度上管制经济的社会中，剥削将会成为合法、合理化的手段，而政府会利用这种手段来从劳动者身上攫取财富并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因为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关于劳动回报在雇佣和被雇佣关系中的角力，如果人的劳动成为了一种义务，那为了保持这个人的肉体能够继续劳动，政府会给劳动者分配仅仅对应于他们的净生产力的资源，而这也仅够这个人存活的，这也正是计划经济难以维持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的工厂待遇更好，工人亦有权利来和雇佣者商议工资，但在集体社会中，劳动者如果想推动这一进程，那么他面对的将是整个国家机器。

干预主义经济的局限性 2022.6.12

区别于纯粹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干预主义也被许多人视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可见的，政府管制经济的手段有如下几种：政府约束企业的行为并反制

垄断，政府调节物价、约束市场中的竞争行为，政府调定劳动报酬，我们逐一来看：

国家约束企业的行为，也就是用强制性的行政力来遏制大企业的发展，或者给较小的企业提供与较大企业相比有很大差别的福利来达到反垄断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公权力一定会演化成恶性权利，而资本主义的特质就是让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与市场的震动都会让新生的企业取代陈旧的企业，只有在盈利不多而陈旧的行业才会有企业长期坐拥垄断的地位，而在更具活力、更有竞争空间与盈利空间的行业中，新生的企业有着取代垄断企业地位的机会，而垄断在这里只是市场发展一个必然出现、必然消失的阶段。

同理的，国家也不能手握更强的约束企业的权利，因为如果国家插手企业间的竞争，将会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国家权力的扩张将会产生更多的暗箱操作，在给企业提供渗透入政府的机会的同时，给政府提供介入市场并从中获利的机会，国家能做的只有维持司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在企业间的诉讼中不保有任何的倾向，把企业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国家能够控制的领域内，从而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规范市场的竞争。

如果企业要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进行竞争，政府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也就是说在企业的竞争开始影响百姓的生活而非触犯到政府所定义的公平之前，政府都应对企业之间的“斗法”保持沉默，因为不正当的竞争并不同时意味着不公平的产生，不正当的手段是不同企业都可以使用的，事实上有些不正当的手段至多只是损害了企业彼此的利益，而非其他人的利益。

政府在进行物价管制时，这种管制的对象一定是国有化的企业或行业，因为如果民间的企业与市场中的某个行业的物价都由政府调定，那么该企业或该行业中的企业的销售额与实际利润的多少，以至于该企业的生存或倒闭、该行业的行情如何，都是政府可以直接决定的，这个企业与行业在实际上已经是国有经济的附属品了，并不是政府只能调控国有经济，而是政府可以调节其产品的价格的企业都可以被视作为国企。

如果市场中的所有企业都是政府干预下的国企，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无异于计划社会了，而如果政府控制市场中的一些特定行业，其控制的一定是关乎其统治根本、关乎民生大计的行业，如基础建设、能源产业、军工产业之类的根本行业，其收入不论在什么形态的社会中，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如果放任市场进行竞争，这些产业的产品的价格也不会低于一个最低值，政府不对其进行管理，则会让这些基础行业在竞争中筛选出能给社会提供更好服务的企业，而政府指派的管理这些产业的人员怎么能够被确信是有能力或是担任其职务的最优人选。而且不在这些行业的运作中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答案是我们无法确信。

如果政府不干预任何企业的运行，而是划定某一行业的产品的价格到一定范围内，从而使物价的上下浮动是有限度的，这种干预的方式是可预见的不可行而且会产生恶果的，在这里政府首先要面对与在管控国有经济时所面对的相同的问题，政府何以有能力划定一个合理的物价，而如果政府的确在常见的行业内划定了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物价范围，这一范围对干预经济能否起到作用，同时进口货物奢侈品与其他特殊的服务的价格如何划定？而在不断的因为货币汇率变化而产生的物价的变化中，政府如何改变物价的范围？这种干预物价的权力，同时会赋予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大盘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张对于社会来说是可怕的，政府的税收与其他社会中的支出都因此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离我们最为相近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是调定劳动者的工资，通常政府会在法律中规定社会中劳动者得到的工资的最低值，而这种最低工资的规定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因为法律中规定的一串数字毫无意义，而正是因为法律无法顺从市场中行情的变化、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化来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如果政府预见到了这一点，把最低工资上调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程度，则会使社会中的企业承受巨大的运营压力，并会有大量的企业因为最低工资的标准过高而倒闭，如果政府把最低工资的标准调低，则是让法律上默许了企业对劳动者的压迫，将标准调至既不高也不低的中间态，则会触犯生产业与其他底层产业的利益，而在实际上在最低工资要被政府法定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与伦理也就是工人的权利并未被普遍保障而法律也并未允许工人组成的工会通过其他手段和企业来商定工资的社会中政府往往会因为为了谋求发展而下调最低工资的标准。可以预见的，如果把调定工资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实际上是给了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并把自

己意志的实现产生的后果分摊到整个社会中所有人头上的权力。

政府迫于压力而不得不经常上调最低工资的现象对于每一位劳动者来说都无疑是有益的，但在这里先要具备两个前提，最低工资标准才能产生效力：政府的强大行政权力与政府对市场的完全放任不管，前者保障企业落实最低工资的标准，而非让其成为一纸空言，后者做保障政府不会通过操纵市场与汇率来抵消提高工资标准而产生的社会成本，而这两个前提是相悖的。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社会只能存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或资本主义形态，程度大小的、手段如何的干预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就会更加深入的控制，市场也会使之暴露出更多的弊端，在这里并不是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是有权利就会产生绝对的腐败，只有政府对市场完全放任不管或接手市场的方式是可以为之的，其他的手段都是促成社会崩溃、与和平或暴力地把社会引向这两种形态的捷径。

谁养谁：自由市场的运行逻辑 2022.6.22

人类社会中介体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人们逐渐开始克服一种变态的心理，同时也会从不明白到明白一个道理：在社会中占有更多资源的人总会有责任去供养占有物质资源更少的人，这是维系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组织，能够持续稳定而不人心涣散的基础，人们在进化中总要去克服的这种变态心理被米塞斯称为“傅利叶心理”，取名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这种心理催使人去仇视乃至攻击占有资源更多的人，而之所以这种心理是要被人克服的，是因为占有了更多资源的人去供养占有资源更少的人，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秩序，这种秩序并不拘于以富人的税收来维持社会福利、雇主阶层雇佣劳动阶层来给他们提供谋生的权利与途径，而已经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普遍伦理，而傅里叶心理会破坏这种秩序，而破坏秩序的行为，我们一般称之为不道德的行为。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在保护个体合理地占有资源并将其用于交易的权利，这等于是法律直接保障了资产阶级霸占资源的权利，但作为立法者与国家的领导者，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和发展，法律在规范资源的所属权利的同时，同时

也保障了资产阶级以外的人的利益，法律规定了工人与企业主应签订怎样的合约，以保证工人的权利不会受到侵犯，法律规定了如何向企业征入更多的税收，以及如何将这些税回馈于社会，法律赋予工会极大的权利，让它代表工人来与企业主相互角力，法律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免于饿死街头而得不到帮助，富人与穷人的财产同样地被法律所保护着的社会是构造社会形态问题的最优解，如果法律不普遍地保护财产权，社会将成为以掠夺争抢为动力推动运转的角斗场，如果社会中的财产是被民众所共有的，或者说每人只占用总资源的一部分，自由经济和它产生的“供养的秩序”，就会在其中消失了，转而由政府代为供养社会，在名义上政府并不直接支配资源，而是由“公众”待劳，而实际上大多数的计划经济社会中平民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很低水准，温饱尚且难以满足，更不用去想如何谋求发展进步了。

这种供养的秩序会不会让资产阶级享有特权呢？在经济活动中更大的企业往往会受到更多不公的待遇，对于更大的企业，政府往往会更加严格的约束，也会向它征收更多的税，自由市场也会让企业主们在决策时如履薄冰，市场的机会是无限的，再大的企业也可能因为一次市场的震动倒闭，小企业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坐拥整个市场。可见的，资产阶级并无特权，而有着供养社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只有政府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它可以行使被统称为公权力的各种权力，它可以决定社会如何运行，决定人民如何生活，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它都有着特权。而约束着政府而不让这种特权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恶性权力的另一种力量，正是由供养的秩序产生的资产阶级的权力，如果没有他们纳税，没有他们给底层人提供劳动的机会，社会就有会在瞬间土崩瓦解，而这些企业主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会去干涉政府的运行，这种干涉是必然而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供养的秩序，也就间接地捍卫了社会中民众的利益，这种约束公权力、保护全社会利益的权利是资产阶级仅有的特权。

政府在面对资产阶级时是无法完全自主的行使公权力的，而在面对如何保障其他阶层的利益的问题时，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强权与资产阶级的强大影响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冲机制，这种机制会保障其他阶层的利益，因为平民的利益是资产阶级而非政府所提供的，政府对于平民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其服务来约束企业的行为来维护利益，在这种公权力被行使的时候，如果政府面对企业行为的约束

行为不够, 则另有劳动者组成的工会与企业相抗衡, 同时公共开支会被民众监督, 对于政府的其他活动也会有相应的机制来迫使其正当行事,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这种有序的前提条件是: 社会中谁养谁的问题的答案是明了的。

竞争的矛盾 2022.6.25

一个社会所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对资源的竞争却是持续而不公平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众对资源的索求与资源的不均衡的现象会极大地激发社会潜力, 同时压低社会的进行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成本, 与之同理的是企业、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的生态也同样会使社会更加快速地发展并提高平民的生活与收入水平。

集体主义社会中, 负责分配资源的支配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其权利应该被法律与监察机关在控制到一定范围内, 但支配者的权力往往要高于二者, 我们不难由此看出: 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很有可能产生独裁统治, 而要让集体社会维持稳定运行, 应当机械地、规则地进行分配与支配工作, 而如果让人来进行决策, 则有很大可能产生偏向和误差, 道理如此, 手握大权的支配者又怎能放弃自己的权力? 资本社会的竞争会产生成本, 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种自主支配财产、自由进行交易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社会的民主性质, 而集体主义社会中也有个体之间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对于社会的推动是极其有限的, 集体社会强调团体协作, 而并不给予个体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而公有分配制也决定了个体通过竞争能获取到的利益是有限的, 社会财富因此几乎平均的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分化为两个阶层: 支配者与被支配者, 这与被认为是资本社会极化结局的奴役社会又何其相似; 而在支配者掌握的资源过多、权力过大的情况下, 没有人再能够威胁到支配者的地位, 由此不难看出: 集体社会天生就带着独裁的色彩。

马克思的理论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二元对立的阶级矛盾, 却忽视了人与人、人与其本性之间的矛盾, 共产理论试图用消除阶级的方式来建立平等的社会, 而忽视了同一阶级中存在的富人与富人之间、穷人与穷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如果社会没有阶级的相互对立, 而要让这一状态继续维持下去, 个体之间就要长期处于一种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状态, 这就导致集体主义难以施行于现实社会, 因为要

想让社会不产生竞争,就必须提高个体的觉悟与品性,也就是摒除人性中的私欲,而如果能使整个社会的觉悟和品性提高,讨论到底是集体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具有普适性就显得毫无意义了,集体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如果贴合实际、还是整个社会的集体价值,则对于所有的体制都会产生好的影响,而如果要对比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可行性与适用性的差异,就要先找到让本来不健康运行的两种社会对于个体价值观改变而开始转为良好运行的一个限度,也就是看哪种体制对于民众的要求更高,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体制激发着人性中善与恶的两面,而集体主义则在遏制人性,集体社会、共产社会要求构成其的个体以统一的伦理标准行事,而做到如此程度的统一,只能用思想教化与集权统治来实现,前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实现,而如果危机或矛盾解除,这种集体思潮会慢慢的消退,由信念支撑起来的社会是脆弱而疲软的,这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往往要施以极权统治,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有哪个极权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屹立不倒,极权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这就是集体主义的怪圈,正是这个怪圈让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了一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幻想。

哈耶克法治思想的简析 2022.7.10

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将他的法治观成体系地阐释了出来,其法治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哈耶克认为:法律首先保障的并不一定是平等本身(再分配资源与不可被准确界定的对等的功绩与酬劳),平等是法律的原则,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实际上是以这种对个人的平等来维护个人的自由,无论是以个人角度出发,通过对互相关系与公共守则即秩序的遵守来维持私人领域,还是以对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约束来看,法治都是一切自由社会的基础。

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并不是提供给个人一种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自由权利,而是提供一种具有一般性、具体性与平等性的普遍意志产生的标准,当人们按这种标准去行事,则默认他选择去适应集体生活,并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到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范畴内,在这个范畴内人是自由的,即使人的行为超出了这个范畴,在他做出这一行为之前,他也是自由的,而后来他所受到的强制,包括被审判,被关押这一部分的机制的运行对于遵守法律的人来说,是一种被包含于

哈耶克的定义中的强制（即以暴力相威胁），从而达到维持秩序的效果，法律下的自由其实也是强制下的自由，对于个人来说，法治并不完全是自由的，正因强制的权利也处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关于实际意义上的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不妨看看罗斯巴德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只有在他或为他所在的地产的所有者允许其行使权力的某一范围内，才能被行使在没有被允许保有这种权利的地产中，他并不能行使这些权利，也就是说记者在报道中畅所欲言，首先是法律给予了他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位记者所在的媒体给予了他行使这种权利的机会，而如果他正作为入侵者出现在他没有行使权力的机会的地方上，很明显他是没有什么自由的，这种自由实际上也是法律支撑下的一系列的秩序所保障的，比如这位记者在家中写作时给自己言论自由权利的地产的所属权，他的报道在新闻中发表时，该家媒体的合法经营权与后者与前置的签订的合约中包含的其他权利，其中任何一种权利如果不被规范的行使，则没有任何人的权利与自由会被保障，正如哈耶克所言：法治的理想要求政府强制他人遵守法律，而且这应是政府唯一有权垄断的事情，又要自己也以同样的法律来行事，从而同任何私人一样受到限制。有关于平等的问题，哈耶克认为只有法律的平等才能导向而不伤害自由，自由不仅与其他任何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也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上造成不平等，而实际上自由，而并不完全平等的社会中的生活要比不完全自由，但平等的社会中的生活要好很多，实际上大多数人体会与追求的平等区别于法律对其的一视同仁而着眼于实在的利益，一些人尝试去追求更近乎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的平等，这种平等对于被分配的人来说是不平等的，因而与自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些人则追求另一种平等，即让自己的报酬与供给相对应，对此哈耶克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使物质报酬与人们所承认的功绩一致，听起来既不被所希望也无法操作，个人位置的高低不必依赖与其同伴对其功绩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劳动产生的成果的价值仅取决于供需二者的看法，而不与其他任何人的认知相应，报酬也应当由两者商定，因为社会对某种功绩对应的价值的普遍认知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而这种对应关系在进行计算时，也是不可能把个人与功绩相关的付出以及人的天赋算入其中，故追求这一种平等的工具与价值的对应关系，在实际上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人天性愚钝，用了比别人多出数倍的时间来学习并掌握一项技能，这项技能产出的成果与其他人得出的无异，但这个人在获得这一成果时，所付出的艰辛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那么这一成果的价值显然要比其他人的成果的价值更高，于理固然应当把相同品质

的产品看作为同一价值，但是这个人的成果有某种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应该被视为这一成果的外在价值的一部分，但如果一个人天资聪颖，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掌握了某项技能并产出了成果，那它的成果的价值又是否要比他人低？在这里我们想要追求的平等，对于愚钝的人与聪明的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是相比于天价的商品更无法让社会所接受的，更不用指望法律来保障这种平等。同时仅能保障的面向个人的平等，也会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这种自由下的不平等现象也被哈耶克论述过：契约下的雇佣状态可能催生出强制，在失业时期雇主可以以解雇为要挟，来迫使雇员从事他们的合约中，没有要求他们所做的工作，在类似于矿场的工作环境中，雇主可能对工人们采取完全肆意的专制，在实际上，不继续从事已经让自己身处压迫中的工作是雇员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让自己失业，也可以选择接受这种强制，然而在这里雇员与雇主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雇主可以借助一种无形的力量，即社会压力、就业压力来迫使其就范，从而催生出专制，这是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带来的一个弊端，也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这个弊端会暴露出来。

哈耶克认为，与保障个人自由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这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法律应该如何通过强制力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哈耶克认为应有一个抽象而并不一定实在但却能影响立法者的“元法律”的概念，对于不同于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政府没有资格对公民的个人努力与成果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只有当公民触犯法律而使其个人财产成为非法所得或侵犯他人的权益时政府才能行使强制的权力，而法治的意义正在于对一切强而有利的手段进行限制，哈耶克认为：法律对政府的限制，只限于它的强制性活动，这是因为国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的过程，具有一种不可抗力，而如果这种不可抗力被利用，则政府的权利就会演变为恶性权力。而要使法律能够限制这种强制权利，必须先有一种被公认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就是“元法律”，元法律正式保障法治的最有效的手段，正如哈耶克所言：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是为了执行某一已知的规则，否则就绝不能对一个个体实施强制，法治就是对任何政府的权力，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一种限制，因此法治并不是法律的统治，而是有关法律应该如何的规则，是一个元法律的学说。

对于法律，哈耶克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必须是已知而确实肯定的，法院通过法

律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应当是可以预言的，与立法过程中的“元法律”同理的，法院对案件的裁判应当是遵循一种难以用文字表述的规则，对于法院来说，从普遍规则中高度概括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这种更高的概括支配着我们头脑的运作，同时对法院酌情裁量权的限制也是保障法治的手段之一，正因高度概括的准则，应用于实际时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法律的解释权在法院的手中，很可能为他人所利用，酌情裁量权，也可能会变成一种专断的恶性权利，哈耶克认为对法治有直接影响的酌情裁量权问题并不是一个，对特定的政府人员的权力加以限制的问题，而是对政府整体的权力加以限制的问题，这也是行政范围的问题，这意味着酌情裁量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的缺口之一，对于保障法治，对这一权力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法治经济，他也可首先指出保障经济自由的重要的一个假定就是法治对经济领域的支配，这一假定的前提是，法律的平等性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在关于法治经济的论证中哈耶克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立场，及政府不应管制经济，应保持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强大能力，而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活动，哈耶克要更加灵活，他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性质如何而非其它动量的大小如何，市场经济中国家应该主导一些经济活动，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推进作用的活动也是被允许存在的，只要政府的活动与自由制度所依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时这些活动才应被排除掉，对于这种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的政府的活动，哈耶克认为法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并可以借此划定哪种活动是与自由市场可以相容的，哪种活动是与自由原则相悖的，令政府按照有普遍的社会意志所立定的法律进行活动，是使自由经济的运行得以保障的重要的前提条件，与法治相关的在此限制政府的权利也是保障自由的重要一环，哈耶克认为政府的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的由一个持久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是个人带着一定限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的最低限度，这是因为政府的强制权力对于自由市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正如哈耶克所言，只要政府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强制权利，尤其是他的征税权来帮助自己的企业，那么这就总是会使这些企业获得一种事实上的垄断的地位，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做到政府给予自己的企业与其他企业优惠是相同的，同时对于一般性的调节经济的法规，如果是同市场的自由原则相容的，也应该给予其一定的空间，法律可以在此给法院标准以判定政府的方案是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统一追求而实施，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政

府对经济的影响的一定的正确性，对于政府对物价的调定，哈耶克认为凡是由政府直接管制的物价，无论是政府实际的划定物价或只是制定了一些如何确定合法价格的规划，都是同运行着的自由制度不能相容的，相比起看得见的手，我们更应该相信看不见的手，因为按照指导着生产的规则来确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持续调定物价是毫无意义而不可行的，而之所以这些管制是难以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能产生更大的恶果的，是因为这类的统治是专制权力的衍生物，真正应当被作为用来调节与约束市场的有效手段，是法律规定了人与人的契约该如何被履行，如果不履行契约，会有怎样的法律来防止暴力与其他的强制力干涉市场的运行，法律界定了人的自由交易权与合法的产权，相较于与自由原则相容的政府插手市场的行为，足够强大的权力有可能使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为指令主义社会，在这种指令主义的社会中，政府为了保障分配的公平，即按照他人对功绩的认知来获取报酬，同时政府给民众分配工作并决定个人奋斗的方向，这种社会对个体来讲是极为可怕的，它剥夺了人根本的自由权利，而政府如果行政自由，也就是说强制权力没有被法治所约束，那么这种非自由但更加公平的指令主义也将难以实行，如哈耶克所言，法治对政府施加的限制也就排除了一切为了保证个人将按照他人的价值观而不是按照他的服务对他人产生的价值获得报酬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或者说法治施加的限制，防止政府去追求那种同交换的公平相对立的分配的公平，我们不难看出政府的强制力管制与市场的自由交易竞争的对立其实是平等与自由的对立，有关经济的问题上哈耶克也再次实证了他的自由与平等观。

对于宪法治度，哈耶克也做了述评，他在此以美国的宪法为例：对于宪法与宪政本身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作用，他认为在政府权力应该受限制的社会共识下，宪法的观念与代议制政府的观念应该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在民主代议制下，人民定期选举出一个代表，而这个代表组成一个民主机构，并与政府的强制权力相抗衡，并成为使人民免受专权危害的保障，这种宪法对政府的约束在于指导日常的立法及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要受到普遍性规则的约束，只有在一种普遍的规则下与意志体现于法律，这种法律才会被认为是公正的，在这里宪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界定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而对于立法的约束与对社会意识的普遍体现在维护自由民主的同时，不会限制人民的意志，宪法治度的建立即意味着公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割与对立，但宪法却并非是最高的准则，如哈耶克

所言：正如支配个人思想的力量一样，对社会秩序施加作用的力量也是多层次的，即使是宪法，也有其根据或前提即作为其根据的，对一些更加根本的原则的共识，这些原则可能从未被明文表达过，但正是有了这些原则的存在，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并制定那些成文的基本法律，对于立法行为本身，哈耶克则认为：在一个能够自主立法的社会中，一群人之所以能制定法律，正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信念，与限制政府的权利同理的人民的民主权力，同样也是可以被恶意滥用的。限制政府的权力、立法的权利、民主的权利，正是哈耶克所持的自由主义的真正旨趣。

21 世纪：中国的围城 2022.8.15

网上有很多问题在问：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自由程度下降了吗？或者类似的，如何看待中国的主席无限期连任？习近平果真如中国媒体所描述的，是一个好的领袖？或是一个独裁者吗？如是的问题看多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老外们仿佛对中国的印象不是那么差，包括了可能的外宣五毛水军的影响，大体也能看出，在西方是有着对中国政治环境不怎么了解，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只是想表达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霸权的看法一些人，把中国错误地具象化了，这种具象的谬误在于，连对中国政治略有关心的中国人都会忽略掉的细节，一些及其微小乃至可以忽略掉的公共事件，累叠起来可以产出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具象，而这个具象是可怕的：中国已经成为 21 世纪的围城，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就像方鸿渐一样，想方设法去脱离困境，但是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救，作品里的围城是浪漫的，方鸿渐也是个浪漫的人，而在现实中类似的这种“围城”并不浪漫，它多来源于无知与有知，就像老外们觉得：自由和人权买不来一块披萨或一块面包，而低保却能让中国最底层的 shitizen 过活，正如新冠期间享受着免费医疗的老百姓难以想象美国人每个月交着上千美元的商业保险，美国人恐也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存在着一个超级霸权，这个霸权将其治下所有群众关在信息茧房、地域困境与真正的笼子里，还在对外作态，通过维持一种东方之于西方的神秘感，以及一个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头等大的经济体的神话，来让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通民众放松对这样一个有着奴性与优越性、劣根性与传承性、无知从众与独立思考并存的、转变思潮及其灵活而又有着包容性的国度放松了警惕。

在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中国人的大一统民族性总是展现着对强权统治的渴望，这

种渴望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属正常的思潮，雅利安人在面对着两千亿马克一个面包的物价时，抛弃了他们作为率先建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民主先驱的政治文化，转而投向一个反人类独裁者的怀抱，而希特勒没有辜负民众的期待，他创造了让经济从疲软转而强劲以致领先世界的传奇。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临危难时往往会尽显丑态，而强权在这时登上舞台的最大意义是维护整个国家民族的颜面，让百姓有口饭吃，换言之如果危难时上台的威权政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了国家民族的颜面，那么短时间内建构的体系可以存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频出纰漏，那将会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挑战，是对政府有无资格继续行使其公权力的考验和质询，在整个中国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要问一句：你们做好了吗？我们先不讲有失偏颇的观点，也不看看外国的所谓抹黑，就事实谈事实，在中国百姓一次又一次高喊相信国家的口号时，政府有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抗疫初期，基建水平较高，医疗条件较丰富，基础医疗较普及的国情下，中国政府选择了清零的道路，又造出了“社会面清零”、“动态清零”这样的好听的词，让许多人都信服了，认为中国政府能像小孩子垒砖块一样造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也就能像大军过境一样横扫疫情，然而疫情爆发的态势不如政府所料，数次反弹导致上海、西安这样的城市封城，大型的经济集聚区停摆，影响的是谁的生活？当然是在当地工作的百姓的生活，而国外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出现，新冠肺炎死亡率降至千分之七，与流感无异时，西方社会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在新冠大流行时还曾向外国人打听复工情况，有人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就已复工，而且已经不再把新冠肺炎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来看，而当时中国社会还正处在全面抗疫全面封锁的状态下）而中国政府选择继续强制“清零”，这里他们要强求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国家的颜面，是一国政府发布政令覆水而不轻收甚至不收的颜面，为这种强求的颜面付出代价的是一户户需要养家糊口的百姓，是西安买着几百块一小袋子菜的百姓，是上海疫情封城《四月之声》中哭诉的百姓，在推土机一般的抗疫政策下，一批批的“大白”被迫上岗（当然也有主动申请当志愿者的，大多都是体制里的或相关岗位的人员被迫调动），一通通的疫苗催命电话被打出去，不问病历，不问身体状况，只求你在这个辖区多打一针，我身边就有打疫苗引起其他疾病不幸离世的人，在网络上也见到过不少。在上海封城期间，有很多人都担心没有吃的会饿死，前几天翻出来很久之前买的一本书《丁戊奇荒》，谁能保证里面路边死人骨，家亡不敢泣的场景不会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重现，当传出那位年近半老的外籍教师被饿死在家中的新闻时，当上海医院

在疫情急需床位时去占用医疗资源来抢救一位外国人异常勃起的生殖器时，中国人没必要感到为此丢脸，丢的不是民族的颜面，是政府千方百计维护的颜面，中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与自身较劲，在支配与被支配中享受乐趣的变态政治团伙。我们不妨再往前想想，河南的水灾中，亲属祭奠的一堆堆花束被圈起不让围观，政治斗争中类似“任大炮”这样敢于挑战公权力的公共人物悄无声息地被迫害，再如现在已经被整治的黑煤窑，站在楼顶讨要仅够自己吃一顿饭的工资的民工，他们在合法地行使着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时被迫害，甚至当我们细下心来，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与政府脱不开干系，《人民的名义》里贪污几亿几十亿的官员可都是体制里的党员，然而当权力与非法力量相勾结产生的恶果作用到普通的民众身上，他们的权利被选择性地忽视了，最终是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甚至连他们身处的事件群众都不得而知的当下，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政府为人民服务。

有人就会说了：我生活挺好的啊，安居乐业岁月静好，这些被迫害的人只不过是违反了游戏的一些规矩，只要我在这些规矩里好好活着，就不会有和他们一样的下场。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到自己的生活中，自己无意识地营造一个茧房，听之所欲听，见之所欲见，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实中的围城是有知和无知的这种信息差产生的，有知在于了解这个社会的细节，好的事物的细节会体现美，坏的事物细节就会体现丑，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意识到这个社会在未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危害的人会想方设法地润出去（移民），而外国人也可能会有羡慕中国人生活而渴望在中国生活的。安土重迁是人的本性，对待生活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引用一句近期清华校内传单的一句话）允许自己保持无力，要明白在如此的强权下，能做到的至多是影响和改变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去移民，去反共，要让身边的每个人不因为自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自己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知的人。

如果你经常关注简中互联网的话，会发现对中国政府行政方向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了，再去看一些有关外国劳动制度的帖文、视频，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一代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一方面相信国家能给社会生活指出一条明路，一方面又不相信国家能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指出明路，不明白（或者明白但不敢说）中国的国

家资本主义体制在运行时产生的资本剥削、压迫实际上是政权和哈耶克所谓经济专制相勾结，生造的一种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在其中说好听话，有温铁军张维为之流讲反垄断和政府管制经济，资本充当政权的白手套，腾讯系、阿里系、顺丰公司是江派白手套，黄光裕用财富铺开大员关系网，三一集团与当朝结亲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政商界就像美剧《纸牌屋》里所展现的一样，大商人与当朝大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而对于那些叫不上名来却又共同组成中国市场大部分民营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可能扒不上当朝大员，也就没有了保护网，而这时中国市场被精心设计的体制在这里就发挥作用了：体制性的勾结、体制性的互相利用、体制性的对下压迫，前者是国家建构的学问，在马列理论中，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要作为思想的前锋，是群众中受教育最完全的那一部分，要领导指挥教育群众进行革命，现在的这套体制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先锋队就是党和政府，区别这两个概念毫无意义，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党政不分、党国一体沆瀣一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政府保有最大的公权力，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分权的政治基因，中国人也就不理解民主二字的含义，多元的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讲起，对于中国，我们不能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必要之恶”来解释，也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定性为天生向善，中国人既不会天生就互相厮杀，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而和别人大打出手，而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渴望大一统、渴望被统治乃至有普遍的斯德哥尔摩心理的民族，正如秦晖《走出帝制》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大一统的基因是传承，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同时渴望着安居乐业，惧怕着背井离乡，纵观下来，我们可以代入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之所见所思：这是一个像头沉睡的野猪的民族。面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政府的恶就不是必要之恶了，你如何巧借东风，如何引导公众，是可以决定能否使民族性与社会文化转轨，改革开放后正是一个巧借民主之东风改变社会的机会，但邓小平和其他的老一代大员都在经济上一定程度的放开，在政治上能不动尽量不动，尤其不能动一党的地位，而由此产生了流血事件，抗议的学生们追求民主的初衷是对的，但运动后期打砸军车，对军人下毒手的行动也是对法律人伦的践踏，在其几十年前的文革中，中国人的破坏力也在领导人的催使下显现出来，十年的浩劫与数月的运动，足以体现出中国人摇摆不定的心理，故中国政坛上浮浮沉沉的多是马基雅维利型的政治人物，但这些人物有着无限的任期，几乎可以忽略的反对的声音，极强的公权力，如果他们的想法跑偏，整个社会就要跟着遭殃，现在的社会体制就是这样，少有企业不偷税漏税的，多数的企业处于只要政府要拿

你是问，就必须坐以待毙的状态，这是人尽皆知的，那么为什么说社会上存在的欠薪、低薪导致工人普遍性被压迫的状况和政府有关呢？并不是因为政府可以解决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得出政府没有尽其职责的结论，从常理来看，百姓消费水平高，政府收入的税就更多，经济也就越有活力，但在这里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国情，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是什么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飞速发展，实现快速的技术化产业化的，是有活力的经济吗？是政府收入的更高的税吗？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社会牺牲了福利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转而选走填充廉价劳动力来给企业带来盈利，以快速实现高技术化的路线，这种路线固然是有效的，现在普遍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肯定有人会讲：中国还有国情啊，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盈余，底层的群众过于庞大导致社会无法维持高工资的同时还让经济持久稳定地运行，这就是在算经济账了，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政府想去解决，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案，不管这个方案带来多大的后果，都是可以被接受或者可以想其他方法去弥补的，工人工资低的情况政府肯定是能解决的，每年在医保上投入那么大，就不能在工人工资上下下功夫，去弥补一下底层民众精神和物质上的空缺，用政府庞大的税收来补齐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或者干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强制性地让企业支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这种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但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来讲，真正受影响的肯定是大多数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而难以扩大产业规模，也肯定会有企业因此倒闭，但这种事的利益双方是无数的劳动者和少数在市场中持续获利的企业，于情于理都应该优先保障蓝领阶层的利益，而如果有人去为资本或者政权去考虑，就犯了立场上的错误：脑子没有跟着屁股呆在一个地方。

这种社会现状，会给普通人未来的个人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人说过：00后的人生普遍的结局肯定是穷死，因为这一代人没有致富希望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还是与国情相关：中国社会没法消化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这只会导致劳动岗位的竞争加剧，以至于劳动力的成本更加廉价，如果政府不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劳动力市场将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其他普遍的社会问题，劳动力价格的恶性循环会产生更多的后果，当所有年轻人步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而政府是恶行的始作俑者和默许者的社会中，他们就会发现：这个围城已经建好了，外面的人想不想进来不知道，里面的人肯定想出去，然而移民只是部分精英人口的选择，大多数群众终其一生就只能生活在固化的阶层中，

这就是现在正在生长起来的这代年轻人的未来，我们先不谈在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生存是否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压在群众头上的一些大山在现在还没有被解决和出现将要被解决的迹象，不论老少，随着过去建成的商用房内置供水供暖系统的老化，现有的住宅楼会在可预见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废置，届时有钱人可以随时更换住宅，而底层的普通群众就要再次为突然出现的极高昂的生活成本买单，现在年轻人手里持有的房子大多是三四五十岁父母一生的积蓄买来的，这些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法再住人时候，中国社会中又会重新多出来一批“房奴”，商品房的总量会随着房地产不断开发而增加，而房产的价格会不降反升，因为把底层群众与天价房产牢牢绑定的，正是中国政府，房子、车子是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毕生追求，同时也是每个人奋斗的目标与动力，社会需要劳动者去劳动，去产出财富，房地产商大多与政府大员有勾结，在中小地区大搞开发，让旧房快速淘汰，新房市场过于饱和，与住房危机同时到来的还将有一系列被设计好应时出现的危机，而每个突发状况都要劳动者付出更多的体力来解决，婚嫁彩礼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生育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成龙成凤”补习班高昂的学费，这些是与每个人生活水平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与钱相关的，而这点可怜的财富百姓也未必能握在手里，从不断涌现的金融理财诈骗产品，到近期的十五万亿救市，目力可及的，中国人的钱在被政府和金融行业揣进兜里，政府通过大肆印钞来投资基建促进经济，造成的通胀后果却要百姓来买单，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人兜里的钱会眼睁睁的被人一分一分地扣走，剩下一堆要用一辈子去还完的债务。

个人未来的发展前景一片灰暗，中国的政治前景更不明朗，中国会越来越像一个“围城”，一个牢笼，这次佩洛西访台就可见：中国这头野猪被唤醒了，中国人的野性不是一般政权能驾驭的，政府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请了神，现在轮到送神的时候，他们反倒送不走了，佩洛西动身前大放厥词，落地后却不置一词，国内许多人大骂习近平政府“脓包”、“废物”，以至当天全网所有平台关闭了评论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国政府打算从长计议，保持战略定力，也就是说中国将会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军队会始终保持作战前紧张的状态，各种人力物力也会被调度到位，为了避免佩洛西访台当天的事情再次发生，中国政府以后将会在国际事务上对内内宣与更严的舆论管控并行，对外继续现在这种虚张声势的“战狼外交”，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孤岛，更有人预言中国会变成“大号朝鲜”，重回闭关锁国的时代，这也不无根据。国内的政治环境更不用谈了，中国政府会逐步打

造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房，强化民众身上的回音壁效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会逐步激化，以之为下一步政治转型做准备。

讲了这么多，我们要问：21 世纪的中国，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吗？是一个狂热的时代吗？是一个冷淡的时代吗？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改革开放到习上台这段时间中出现了牟其中、何阳这种思维大师，有朱新礼、牛根生这样的实业家，也有唐万新、黄光裕这样的红色资本家，也有翟山鹰、高晓松这种启蒙导师，也有李洪志这种人造神，这是一个骗子横行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其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当下或锒铛入狱或被人批驳的一文不值，即使是现今的公共人物，也会因为一些可大可小的事被人拎出来反复批斗，在网络上，能感受到的网络环境非黑既白，观念意见相悖的聊天者会争论不休，发表中立观点则会被认定为“理中客”，网友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用一句话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不对的，进行理性的讨论、观点的交错反而是少见的现象，多见的则是谩骂、侮辱以至“人肉”，大多数的网友吧自己现实生活中不敢发泄的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尽情挥洒，现实中的交际反倒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现在的时代主题是粗暴、粗糙，粗糙是风格，粗暴是做法，至于到底是网络把人变得粗暴粗糙，还是粗暴粗糙的人让网络环境变得如是，两者或许皆有，随着人们投入在网络空间的时间越来越多，网络开始掌管人们的情绪，你的网友们说什么、信什么会影响你的心情，平台决定的给你推送什么新闻消息也能决定你的心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进行意识形态的大战与进一步的舆论管控，所以在中文互联网中，大量的爱国人士成为了政府的义务警察，为政府义务稽查，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予以回击，当这种行为成为运动，以至成为潮流时，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就在政治上极为不正确，这让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西方思想被排出于信息茧房之中，粗暴而粗糙的网民们就在一个一石激起千层回响的茧房中闭门造车，他们积累的民族情绪愈发狂躁，而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公众运动的动因不谋而合，“网络文革”也就诞生了，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每个思想政治正确的人，都可以尽情在茧房中去批判自己不认同，不理解，不支持的意识形态，网友们可以肆意大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骂到最后只是让自己不快。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这种互联网环境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会有大量的国内互联网用户“翻墙”，使用一些软件规避国内的网络审查，体验一把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不是

单不受政府监管的自由，同是不受其他网民监管的自由，也就是逃出了“围城”。

政治的转轨与思维的改变 2022.11.18

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生了转轨，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随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趋步滑向过去的形态，我们不仅要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再转轨？社会中总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习惯、一种守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某种群体潜意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与政治基因在作怪。

中国在秦朝时就建立了一套社会制度，这种“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的马基雅维利式体制，锚定了中国历史上秦之后其他朝代的社会建构的方向，这也就是秦朝之后，大多数的朝代都在表面用一套学说来引导大众思维，在建政问题上都延用秦制的缘由，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套方便统治者实行公权力的体制，让中国历史上秦往后的朝代都深陷其中，难以脱困，这种体制能让专断的王权延续很长时间。在古中国，没有高效分配机制的经济环境，没有合理监督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多元包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是导致中国千年以来未能走出秦制，走出封建，从而走向更高效、更先进、更文明的体制的根源，这种法家社会会营造一种达尔文式的环境，这种环境会驱使底层的民众不息的劳动，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尝试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跟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爆发的革命，往往是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文明的理念的推动下，产生的引导社会向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革命，而中国的革命的领导者却多难以抗拒皇权的诱惑，从而使历史一遍一遍的往复，这是令人赶到悲哀的。

这种不断延续下来的体制产生了另外一个并发症：也就是这种体制塑造了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是被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头的，历史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是现象，而我们要探讨的根源是如何让中国人的文化与政治基因发生变化，已经有不断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没有约束的皇权、没有分权机制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存续很长时间的，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产生的观点，而当我们把眼光放向中国的社会，我们会发现：之所以

那些封建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除了皇权政治、法家思想的政治基因，还有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因素在其中，周孝正教授讲过：中国自古以来多草民、愚民、贱民、暴民，而少公民，底层的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建政意识与政治意识，多数的思维还都存留在局限于他生活环境中的安逸，这种小民思维在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不能说有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所存在于的政治主体，远大于他所能接触到的环境，那么这种小民思维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这种思维将民众禁锢到一个笼子里，他将很难接触到高于他所属层次的东西，这就导致他无法去探查到更高层政治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即将经历的动向，只是在高层向下发出决策时去接受结果，再加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官本位思想，高层的统治者对底层的民众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古来就有君明而民驯贤、君桀则民暴乱的说法，大多数的百姓持有着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想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也逐渐跟进世界的潮流，政治形态上开始往民主的方向转轨，但是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却凸显出十足的艰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八九民运与千禧年之后不断的民族运动，从上个世纪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到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领导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出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法律体系的残缺、宪法效力的减退、高层政治的黑箱博弈、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民主体系的不断崩解，如果我们要去细数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那将可以成一本罄竹难言的书。但从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下，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旧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基因，这种个人崇拜、渴望被统治、笃信政府公权力的思维是导致现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滑向旧体制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要让中国社会、中国人与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我们先要经历的一个进程，就是彻底的改变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基因，如果我们不尝试去做这种改变，还让这些劣根性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人永远看不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走向现代的那一天，这也是秦晖教授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走出过去就是走向未来。